

全球对话

12.3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种语言刊出

与Michele Ford 谈社会学

Dimitra Laurence Laroche

Michael Burawoy 与公共社会学

Svetlana Yaroshenko
Elena Zdravomyslova
Sari Hanafi
Margaret Abraham

交织性的 讨论

Kathy Davis
Helma Lutz
Ann Phoenix
Barbara Giovanna Bello
Ethel Tungohan
Amund Rake Hoffart

理论观点

Koichi Hasegawa

透视乌克兰

Nataliya Chernysh
Yuriy Pachkovskyy
Darie Cristea

议题开讲

- > 为何我们需要 LGBT+族群的比较交织资料
- > 认可、引述与知识的不正义
- > 中东欧的盈利身体与照护流动
- > 仲介家务工作:斯里兰卡—沙乌地市场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2卷 / 第3期 / 2022.12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主編的話

本期「社会学对话」由 Dimitra Laurence Larochelle 专访著名科学家 Michele Ford。在访谈中，Ford 针对自身于国际劳工组织的谘询经验、社会学研究者的挑战、劳工权利面临的困境等主题，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本期刊物的首个专题，以 Michael Burawoy 最为人所知且发人省思的作品为焦点。作为ISA前会长以及《全球对话》的创办者，Burawoy开启了一系列有关公共与全球社会学的思潮。在本专题中，现任ISA会长 Sari Hanafi、前会长 Margaret Abraham 与 Svetlana Yaroshenko、Elena Zdravomyslova 回顾了自身过去与 Burawoy 合作的作品，并探讨其近日出版的著作《Public Sociology: Between Utopia and Anti-Utopia》，更由不同观点讨论公共社会学的发展。

本期第二个专题由学者 Kathy Davis 与 Helma Lutz 筹办，呈现交织性的著名理论与概念如何在不同脉络中被建立，并重新实践、发展，也简介交织性如何透过不同方式影响世界、学者与倡议者又如何思考本地与全球的不平等、权力及社会变迁。其中，Ann Phoenix、Barbara Giovanna Bello、Ethel Tungohan 以及 Amund Rake Hoffart 的文章，涉及了多个相关主题。

在理论观点中，Koichi Hasegawa 由社会运动研究的视角出发，以「周五为未来而战」运动为研究对象，关注其中的文化构框、资源动员、政治机会结构等现象，并分析这些行动何以成功？相较于其他国家，这个运动在日本的参与度又为何较低落？

本期的国家社会学专题，则是以乌克兰于2022年遭受的侵略性战争为焦点。Nataliya Chernysh 关注社会

学在后全球化时期对这场战争产生的影响，并尝试与全球化的社会学论辩对话。Yuriy Pachkovskyy 讨论遭受入侵的实际经验、集体创伤，以及战争带来的后果。Darie Cristea 则试图探问——在「安全困境」、反系统运动和政党崛起的情况下，社会学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议题开讲中，Sait Bayrakdar、Andrew King 和 Jana Bacevic 反思科学、代表性研究与调查、认识论议题当中，对于多元、交织应该抱持着敏感度的必要性。Petra Ezzeddine、Kristine Krause 与 Wasana Handapangoda 则探究当代照护工作跨国市场化的不同模式。

担任本刊物主编至今，已经有五年的时间。当时，我们知道能够接下前主编／创办者 Michael Burawoy 的岗位是一种荣幸，也是一个挑战。如今，我们担任编辑的时间也即将走到尽头，这几年来做得如何，就交给读者去评断。必须感谢期间担任助理编辑的 Raphael Deindl、Johanna Grubner、Walid Ibrahim 和 Christine Schickert，你们在这几年里付出了许多，谢谢你们协助产出这么多精彩、发人省思的成果。我们也要感谢世界各地的区域编辑、团队，你们让《全球对话》有幸成为全球性的、跨越学术／非学术藩篱的一本刊物。还要谢谢管理编辑 Lola Busuttil、August Bagà，你们是刊物的创意与组织大将；副编辑 Aparna Sundar 和 Christopher Evans 为文字编辑贡献良多；ISA主席和秘书处更一直给我们许多支持；过去曾投稿的所有作者，为我们带来全球各地生动且深入的社会学观点。非常庆幸我们有机会成为了了不起的《全球对话》团队一员，我们会想念你们的。我们现在非常高兴地欢迎 Breno Bringel 成为新的编辑，他是国际知名的政治社会学家，也是ISA的长期活跃成员，毫无疑问，他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推动《全球对话》的发展。■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對話》主編

> 全球对话以多种语言刊出，请至 [GD 網站](https://gd.org/)。

> 投稿来信寄给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编辑团队

主編: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編輯: Raphael Deindl, Johanna Grubner, Walid Ibrahim.

副主編: Christopher Evans.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顧問: Michael Burawoy.

媒体顾问: Juan Lejárraga.

编辑顾问: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Nazanin Shahrokni.

各国編輯

阿拉伯世界: (突尼西亚)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黎巴嫩) Sari Hanaf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io.

孟加拉: 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Fatema
Rezina Iqbal, Mumita Tanjeela, Mohammad Jasim
Uddin, Bijoy Krishna Banik, Sabina Sharmin, Abdur
Rashid, Sarker Sohel Rana, Md. Shahidul Islam, A.B.M.
Najmus Sakib, Eashrat Jahan Eyemoon,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Shamsul Arefin, Yasmin Sultana,
Syka Parvin, Ruma Parvin, Saleh Al Mamun, Ekramul
Kabir Rana, Sharmin Akter Shapla, Md. Shahin Aktar.

巴西: Fabrício Maciel, Angelo Martins Junior, Andreza
Galli, Ricardo Visser, Gustavo Dias,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法国/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 Rashmi Jain, Rakesh Rana, Manish Yadav, Pragya
Sharma.

印尼: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Elham Shushtarizade.

哈萨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Madiyar Aldiyarov.

波兰: Urszula Jarecka, Joanna Bednarek, Marta
Błaszczczyńska, Anna Turner, Aleksandra Biernacka.

罗马尼亚: 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Bianca Mihăilă, Ruxandra Păduraru, Ana-Maria
Rențea, Maria Vlasceanu.

俄罗斯: 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臺灣: 李宛儒, 呂道詠, 洪柏勝, 廖宇雯, 黃翊碩, 簡芊樞, 郭智
豪, 賴奕璋, 林韻柔, 周芸瑄.

土耳其: Gül Çorbacioğlu, Irmak Evren.



本专题中, 作者们探讨了全球对话的创始人、ISA前主席 Michael Burawoy 的学术著作, 特别是有关公共社会学的那些作品。



来自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研究者, 探讨了乌克兰的现状和俄罗斯的侵略战争, 以及这将对社会学造成的影响。



理论部分, 将从社会运动的观点解释为什么「周五为未来而战」运动能成为近期最成功的集体行动。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目錄

主编的话	2
------	---

> 社会学对话

全球地行动：社会学家如何捍卫劳动权利 专访 Michele Ford Dimitra Laurence Larochelle, 法国	5
--	---

> MICHAEL BURAWOY 与公共社会学

俄罗斯的公共社会学 Svetlana Yaroshenko、Elena Zdravomyslova, 俄罗斯	8
将公共社会学推向对话社会学 Sari Hanafi, 黎巴嫩	11
对 Michael Burawoy 以及公共社会学的反思 Margaret Abraham, 美国	13

> 交织性的讨论

思考在地与全球的交织性 Kathy Davis, 荷兰、Helma Lutz, 德国	15
交织的过去萦绕于交织的未来 Ann Phoenix, 英国	17
社会运动的交织视角 Barbara Giovanna Bello, 义大利	20
交织的团结与移民照护工作者 Ethel Tungohan, 加拿大	22
寻找交织性的正确隐喻 Amund Rake Hoffart, 挪威	24
交织性作为一种批判方法 Kathy Davis, 荷兰、Helma Lutz, 德国	26

> 理论观点

周五为未来而战：社会运动的观点 Koichi Hasegawa, 日本	28
--	----

> 透视乌克兰

乌俄战争如何影响社会学 Nataliya Chernysh, 乌克兰	31
集体与个人创伤 Yuriy Pachkovskyy, 乌克兰	33
乌克兰战争改变了我们的认知 Darie Cristea, 罗马尼亚	35

> 议题开讲

为何我们需要 LGBT+ 族群的比较交织资料 Sait Bayrakdar 和 Andrew King, 英国	37
谁知道？认可、引述与知识的不正义 Jana Bacevic, 英国	39
中东欧的盈利身体与照护流动 Petra Ezzeddine, 捷克、Kristine Krause, 荷兰	41
仲介家务工作：斯里兰卡—沙乌地市场 Wasana Handapangoda, 奥地利及斯里兰卡	43

『社会学中，我们很容易被微观的研究局限——这种研究固然重要，但将特定议题与更大的问题连结起来也很重要。』

Michele Ford

> 全球地行动：

社会学家如何捍卫劳动权利

专访 Michele Ford



Michele Ford 教授是澳洲悉尼东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她的研究领域涉及东南亚劳工运动、国内与国际工会之间的交织、劳动移民、政治领域的劳动参与等主题；其研究取得了ARC以及其他相关组织的资助。她目前主导ARC发现计划中，有关缅甸服装业、印尼商业捕捞业劳动关系的研究；并且正参与ARC连结计划内，针对柬埔寨建筑业工会如何处理性别暴力事件的研究。除了上述学术计划，Ford 也于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劳工运动、澳洲政府等单位中，参与顾问相关工作。

法国法兰西综合理工大学博士后学者 **Dimitra Laurence Laroche** 则担任本文的访谈人。她是国际社会学协会的联合国青年代表，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学协会传播、知识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委员会(RC14)理事、《Art Style | Art & Culture International Magazine》副编辑、国际期刊《THESIS》的编委会成员。

D.L.L.: 可以请你和我们谈谈你和ILO的关系吗？你和他们合作多久、以什么方式合作？

M.F.: 我首次和ILO接上线是在缅甸。2013年时，我正好在进行一个研究，探究当地的转型之下，工业关系如何受到影响，也因此访问了一些在ILO工作的人。由于那时在悉尼东南亚研究中心任职，我觉得从进入机构，为工会、受雇者、政府当局举办工作坊，协助他们了解其他国家针对工业内部的劳动关系大概做了些什么事情，应该会挺有帮助的。我向ILO缅甸办公室提出这个想法，

他们也很乐意和我合作。最后大约有70到80人参加活动，部长、相关指导人员也在其中，算是一场挺不错的活动。在那之后，其中一些参与者——他们现在在ILO中的职位已经有一些改变——问我能不能提供其他帮助；例如我后来和一位同事共同针对亚洲八个国家的服装业，发表了一篇初探性的论文，就是由ILO的区域办公室资助的。

2019年，我和全球工会到日内瓦进行田野调查。某个在ILO任职的人因为读了我有关全球工会、劳动移民的研究，想请我做一些分享。在那段时

>>

间,我访谈了几个人,其中一个工人活动局亚太部门的负责人;他后来也委托我研究印尼的棕榈业劳动者和亚太地区的数位工会策略。

有趣的事情是,虽然我发表的许多作品对于ILO带有很强的批判性,例如分析组织在缅甸扮演的角色那篇文章,不过我发现,过程中接触到的人们对这点其实抱着开放的态度。当然,如果他们不开放,可能就不会和我接触了。总之,我在ILO接触到的人,都很尊重我作为批评者/局外人这样的角色。所以,我不觉得和他们互动是某种妥协。如果我那样觉得,我就不会这样做了。

D.L.L.:请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在如何在ILO中运用社会学视角和技能的?确切来说,我想请你解释,身为一个社会学家,要如何协助联合国为劳动相关议题提出更好的解方?

M.F.:我认为主要的帮助是把学术的视角带进来。我们可以看到机构所不能看到的。如果你有关关注ILO的工作模式,会发现有很多人接受研究委托。在这方面,ILO一直给予我很大程度的自由,因为我筹办的这些研究,大部分都不是评估,而是以背景研究为导向。相较于我协助全球工会进行的评估工作,这有相当大的不同。在这里,ILO会希望我能提供他们特定问题的答案,不过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或限制,我可以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例如筹办计划。总之,在这边,我可以决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资料,还有如何收集、处理这些资料。

刚开始在这边工作的时候,我还担心自己的成果会遭受审查,因为ILO本来就对于政府、工会、雇主的观点比较敏感。不过还好没有这回事——当然,有的话我早就停止合作了。我不曾感觉到自己受到任何限制,这实在让人感到开心又惊喜。或许这就是他们喜欢委托外部研究者的原因(笑),这样才能让更多讨论的观点被看见。

D.L.L.:你前面提到,对于你给出的批判性回馈,ILO内部的人员抱持着非常开放的态度,而且没有限制你的任何行动。不过,你有没有遇到任何其他挑战?应该说,身为一个社会学家,在任职于国际组织内部时,可能会面临哪些困难?还有当你遇上问题时,又是怎么解决的?

M.F.:老实讲啦,任何组织可能都不会想被这样讲(笑),不过ILO真的还满官僚的。也因为这个

特质,他们的任何行动都特别缓慢。举例来说,在其中一个研究计划里,他们帮我安排了一堆亚太地区工会的访谈。当然,这一方面来说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交给我自己来处理的话可能会更快一些。官僚主义经常很需要人来引领方向。他们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所以和他们合作,就得习惯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的机制可能就会特别不一样,例如透过和一个比较小、更有弹性的组织合作,来加快工作的速度。另一方面来说,和他们合作也带来了一些优点,因为在知名度这么高的ILO底下做研究,对于我的履历还是满有帮助的。毕竟我是一个全职教授,这项经历可能对我的学术生涯没太大用处,但对于其他类型的应用工作来说,有帮ILO做事真的还满提升我的声望的。

我觉得,如果我是以顾问维生,而不是以学术维生的话,可能情况就会满不一样的——这种处境下可能会有更多困难,因为ILO没有提供那么好的劳动环境和薪水给顾问。不过身为学术工作者,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们确实有左右特定议题的机会,是吧?当这群人能决定ILO接下来要展开的计划,而我们有幸影响他们的决策过程,绝对是一种特权。这就是一种,将我们的学术、知识技能应用于现实世界的方式,而且有可能真的能产生具体成果,毕竟ILO是个具有影响力的机构。

D.L.L.:你觉得和联合国合作的社会学家,可能会受到怎样的限制?

M.F.:我觉得,联合国系统底下的组织都很庞大,也有很多相关利益者。因为这样,所有事情都要经过仔细的政治考量。另外,ILO的资金来源相对比较小,所以他必须在各方面能符合资助人的取向。有时我们能产出很不错的成果,但有时候即便能有好成果,也可能因为拉不到资助而放弃计划;还有些时候,你懂的,人们的成果被「校正」成其他形状,以符合赞助人的想像。在ILO,提供资金的就只有那少数几个国家。这当然会影响组织的议程。这未必是负面的,但终究是对于社会学家发挥作用来说,造成了某种限制。

D.L.L.:从2020年开始,全球疫情一直阴魂不散,对各地的劳动与工作条件有很大的影响。因应这场疫情,你推动了哪些政策来强化工人权利?在你看来,是否有一些领域被忽视了?

M.F.:其实忽视的程度没有那么大,只有某些关键的领域里面,有些比较迫切的问题,像是供应链的条件没有那么被关注。以服装业为例,面临疫情时,物流出现瓶颈、消费者订单下降,工厂突然间就没有订单了。他们只好减少员工的工时,或是请他们走人。遇到这种情况,公司通常会抓住机会,宣扬自己为劳工付出了什么,但是疫情下,你会看到公司很快就退缩了。过去二、三十年间,包含ILO等行动者,在国际劳工治理上推动了许多进展。不过,距离实际建立制度、让跨国公司在劳工权利问题上做得不好的时候受到制裁,我们还有长远的路要走。

目前,研究劳动与劳资关系的社会学家,对于零工经济很感兴趣,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这类劳动的正式化。在印度和印尼这类国家,这些过去是非正式劳动者的劳工,现在至少有了动员反抗的对象;但是同时,这些零工经济的平台又很强大,可能会危及劳工权利的维护。在一些最近的案件里面,送货司机已经开始被视为是真正的劳动者,这当然很值得高兴,但我不认为现在的ILO或其他人,真的已经知道要怎么去规范这些新兴的劳动形式。

ILO这些年来做了很多努力,尝试更好地理解非正式劳动。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确实受到数位平台劳动的兴起所影响。概括而言,数位平台劳动是介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一种劳动形式。我认为,这对于试图影响现实世界的社会学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尝试找到一些方法,让非正式劳工的利益能被体现出来。

我想,这就是我最重视的三个问题。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也不是特别和疫情有关,但疫情确实让这些行业里面本来就存在的问题,重新被人们注意到。另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是福利国家的退缩,更别提那些本来就不是福利国家的地区。在现在这个时代,国家的福利政策对于个人的重要性,又特别地被凸显出来。生活在挪威、希腊、

刚果,面对疫情这类事件,会有很大的差异。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提醒了我们,应该要重新把福利国家建立起来……总而言之,这场疫情确实让我们再次意识到完善的社会安全网有多么重要。

D.L.L.: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要提供给那些正尝试在国际层级开展生涯的新进社会学家或社会科学家?例如一些和工作机会有关的资讯?

M.F.:联合国系统底下的组织,本身就是新进社会科学学者很大的工作来源,不管是在联合国系统内部,还是相关的其他组织里面,都有很多工作机会。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机构里,也有很多有博士学位的人。

如果你已经走上学术一途,那么我会觉得,和ILO这样的组织合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这让我们的研究能脱离微观层次,根植于现实。社会学研究其实很容易被困在微观层次,并不是说这部份不重要,只是学术研究能和更为巨观的现实世界对话,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观察联合国这个体系如何运作,有助于我们提出这类层次的问题,即便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不是这些体系想要听到的。我认为,借由成为投入组织运作、同时保持批判的行动者,我们可以影响系统本身,甚至进一步将影响扩及受之服务的、世界各地的群体。

在实践上,加入团队、建立研究领域的网路、接触其他实践者、成为贡献者之一等等,对于新进研究人员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如此一来,有人在找合作对象时,他们可能就会想到你。一旦你有了网路,接下来就是证明自己的价值。最后,你也会成为人们遇到问题时,愿意寻求协助的对象。■

來信寄至:

Michele Ford

<michele.ford@sydney.edu.au>

> 俄罗斯的公共社会学

Svetlana Yaroshenko 和 Elena Zdravomyslova, St Petersburg Association of Sociologists, 俄罗斯



「圣彼得堡的公共社会学辩论」, Eugenia Golant, 2015。

本篇将讨论目前俄罗斯面临的公共社会学困境。我们处理的潜在问题是：该如何在一个政权尚未确立的地方谈论专业承诺？我们目前正身处在一个「特殊武力行动」的真实反乌托邦梦魇中——乌俄战争——在此我们将解释在事件的初始阶段对社会学的影响。我们参考了在俄罗斯进行的研究与讨论、我们自身的专业知识，以及 Michael Burawoy 于2021年出版的书籍《公共社会学：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我们已经事先与同事们讨论过本书内容，其中包含被麦克·布洛维在他的新书序言中提及的学者，和其他对俄罗斯公共社会学有所贡献的研究者。

> Michael Burawoy 带来的启示

Michael Burawoy 指出了几个非民主政权在社会学上的特征。他坚称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下，社会学仅具备传递党国意识形态的作用，并以听命于政府政策的形式存在。学术自由受到限制，学者们也面临严格的学术行为管控。笔者认为这般党国取向的状态是俄罗斯社会学界不乐见的，但同时也难以克服此现状。

然而，批判性社会学的反叛潮流以及其对社会的高度开放，对俄罗斯社会学界来说非常重要。在经验主义社会学以引导政策研究的形式存在的同时，

也有社会学家正在为了研究专业的自主权抗争，以争取提供专业且中立的研究内容和在学界与非学界公开讨论的学术的可能性。俄罗斯社会学家长期为了成为公众知识份子而奋斗着，在苏联时期最优秀的社会学家曾悲伤的抱怨过他们的身份十分微不足道，也没人关注过他们的研究，但他们提出了对社会的观察，并在专制政权底下给予这些尽管无人聆听的建议。

Burawoy 表示若要让学术界蓬勃发展，公众参与是必要的，俄罗斯的社会学家在经过反思后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在讨论俄罗斯两千年初期情形时，学者们同意当时是因为公民社会的薄弱、制度化的差距和自主性的不足导致理论和专业的匮乏 (Romanov & Yarskaya 2008; Sokolov 2009)。部分学者认为民主化和国际间社群的交流能够帮助俄罗斯渡过专业知识不足的限制和位于党国从属位置的社会学界；另一部分人则强调破碎化的趋势和专业交流的不足 (Lytkina & Yaroshenko 2019)。

> 21世纪的公共社会学成就

在后苏联时期，社会学在公众的能见度有所成长。公共社会学的主张总有与整个社会学界引起共鸣。新一代的俄罗斯社会学家相信实践社会学研究即代表与大众交流，研究多以草根倡议或非政府组织为主题。因此有机公共社会学的概念在俄罗斯的学术界得到支持。

但大多时候我们仍能看见传统公共社会学所带来的影响：公众演讲、访谈、学者评鑑、研究资料的普及；这些行为现在都已被纳入专业度的评分项目中。公众参与为学术单位及个人都带来实质意义以及象征性的好处。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俄罗斯社会学家学会了如何与媒体交涉（透过了解相关事务的可靠媒体代言人）。这些应对方法的习得成为了俄罗斯公共社会学的成就。已经有一段时间，俄罗斯的一次政治分裂成为了社会学界重要的特征。直到最近，不同阵营的代表都找到了各自进入公众领域的方式。例如批判型的公共社会学家找到了适合的研究发展方向，有许多机构都已准备与与他们一同共事，包含莫斯科回声电台、诺曼亚报社，和其他线上资源。

>>

然而，因为日渐严格的自主权规范，公众活动日渐减少。带有批判立场的记者与研究者，无论是代表个人抑或团体，都被强制逐出官方的公众领域。他们有人被贴上外国间谍、透过自我审查来进行思想转型，也有人直接遭到清算。

> 压制型法律、公民社会的打压和窒息的公共社会学

在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政府对乌克兰发动「特殊军事行动」之前，独裁政府便已经成功打压俄罗斯的公民社会，限制有影响力的阶级干涉国家政策。近期出现的政治迫害都因为俄罗斯立法机构通过的压制型法律合法化，这些法律是因为2011到2012年间针对选举舞弊出现的大型抗议而被创立的。具体来说，《同志宣传法案》(2013)限制LGBTQI+社群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更将其非法化，这也促使了俄罗斯的性别研究更加窒碍难行。《外国代理人法》(2012)也让公民社会变得窒息，并限制了私立机构在有机公共社会学方面的相关研究。这个法律最初的目标只有参与政治行动或接受国际援助非政府组织，现在社群研究的相关团体也成了他们锁定的对象。人权团体和非政府研究机构，例如：纪念、列瓦达中心、独立社会研究中心和性别研究中心是第一批被列为外国代理人的对象。这个恶意的标籤让社会研究变得更加不易，出现了国际合作缩减、资金不足和行政花费增加等问题(Skibo 2020)。

压制型法律的通过也同样压抑了俄罗斯的公民社会，大众的声音变得更加难以被听见。原先活跃的公民、社会倡议和非政府组织都害怕遭到迫害。大众集体的恐惧氛围和政府的实际迫害行为让公共社会学变得越来越难获得喘息的空间。

大多非政府组织为了避免被贴上标籤而选择采取自我清肃的方式(许多性别研究中心在这段时间关闭)。有少数被贴上外国代理人的非政府组织持续进行他们的活动，作为一种生存的自我实验。自我审查变成另一种常见的策略给那些在这窒息的氛围下仍想照常活动的研究者与记者们。虽然官方的媒体已经对与国外代理人的交流加以限制，社群媒体上仍创造了另一个能够自由讨论的社群空间。

然而这只是俄罗斯政府面对那些仍不愿噤声的公民社群的最初手段。这两年新冠肺炎的流行帮助了独裁政权阻止公众集会、大型抗议的发生，也让大家的注意力从关心国际事务转移到健康和个人生活品质的维持。

> 反乌托特殊军事行动邦与被压抑的公共社会学

乌俄战争开始后，则更雪上加霜。新的压制型法律禁止了公众讨论，并且非法化抗议行动。2022年国外代理人法案的修法扩增了他们的目标名单，并且为政府造成的迫害找借口。新的「不受欢迎组织」和「不友好国家」名单让学术界的国际合作公亏一篑，公共社会学的学者很容易被归类为国外代理人并成为被迫害的一员。甚至连试图持学术中立观点的学者和机构都有可能遭殃。

在此氛围下，过去政府派和批判派的社会学分界又再次出现。战争爆发之后，有些社会学家透过公开信表达自己的立场并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抗议。许多抗议者随后必须选择先前往其他国家居住(希望只是暂时的状况)。

2022年3月，媒体公开了一份由180个校长署名的战争支持信。这个政治行为虽然能一定程度的保障这些校长所代表的大学和其中的职员，但也让他们成为国际学术界抵制的对象；同时，也有人签署反战声明。独立的研究者和组织纷纷在社群媒体上(Facebook、Telegram、Instagram)发布反战宣言。这份反战宣言强调战争对俄罗斯社会和学术界造成严重的后果(Dubrovsky & Meyer 2022)。就在战争开始不久后，Facebook 和 Instagram 双双被俄罗斯封锁使用，仅有在透过虚拟专用网路方能使用。

然而，大部分社会学家避免对乌俄战争发表言论，他们表示这是因为考量到「学术中立」。这些学者认为作为研究者，应该提供学术上的专业研究结果，并且远离政治问题。

这个貌似合理的论述是因为社会上弥漫着恐惧的情绪所导致的，这样令人窒息的氛围也对公共社会学造成严重的影响。但仍有一些社会议题仍坚持继续在公众下继续被讨论。

> 对民意调查的批判

有一个关键性的主题与传统公共社会学直接相关。另一派的社会学家批评在独裁政权和军事警戒时期采取民意调查的研究方法。他们表示研究中支持军事行动的结果不应该被看作是民众真实的态度。民众间恐惧的氛围会扭曲他们的答案，传统公共社会学变成操弄政治的工具，研究结果也被当作支持军事行动和经济制裁的证据(Yudin, 2022)。这样的批评在反传统公共社会学派得到一致的认同，而其他人则相信表象的数据结果。

>>

> 社会学家的策略

当学术自由缩减以及公共社会学被压迫，社会学家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大部分的学者一如继往的进行他们的工作，并没有感受到工作上的变化。通常他们相信仍有展现学术责任的空间，并且冷静地继续进行研究。我们的同事强调他们的教育责任，强调帮助学生走过无助和失望感的重要性。很多学者认为现在是进行战争地区田野调查的最佳时机，其余则转向分析极权主义和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他们认为这将对分析当代社会变化有所帮助。

我们看见许多学生和学者对我们的专业感到失去希望。他们意识到参与公共社会学是一件多么危险的行为，以及将学术专业与社会参与结合所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恐惧和对继续在俄罗斯从事专业研究所感受到的无望让学者们在危机下产生疏离感（希望是暂时的）和转换跑道。公共社会学能够发展的空间不足，使未来发展严重缩减，仍在反抗的社会学家目前正努力创建一个替代社群媒体提供公共讨论的空间。

> 另类公共空间作为真实乌托邦的希望

仍在抗议的社会学家正努力让自己的声音被俄罗斯和世界听见。他们的策略是继续学术研究并在另类公共空间提高自身声量，这个另类空间因为新的资讯技术而变得有所可能。拥有抗议意识的记者在全世界透过疫情期间快速增长的网路空间活跃着，他们主持公开的空间，讨论俄罗斯国内敏感的生命议题。Telegram 和 Facebook 创造了这样的公共空间给反对军事行动的人们，但这些活动有受众的限制和同温层的问题。

在这个另类空间中，社会科学家们以公共知识份子的身份讨论着国外事务并探究更多新极权主义、独裁政权、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论。他们正在努力找出俄罗斯政权的象征，许多人认为他们对社会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有责任于身。他们问自己：我们遗漏了什么？我们该如何防止战争的发生？为什么我们的预测会错误？

> 结论

对公共空间的压迫代表了公共社会学正感受到令人恐惧的窒息：一系列失控的状况让我们的身体因为缺乏氧气而无法呼吸、动弹不得，这是一个有害身命的状况。在俄罗斯独裁的统治下，公共社会学的实践可行性因为民众间的恐惧和实际的镇压行为而变得微乎其微。传统公共社会学面临严格审查和民意调查被拿做政治武器的情形，但公共社会学仍持续存在于国外地区和社群媒体上出现的替代公共空间。

我们现在生活的反乌托邦社会如我们了解到社会学的传统研究是建立在基本的道德承诺上和彼此之间坚定的民主价值上，包含自由、理性、平等、团结。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累积专业知识并在未来供大众使用。现在的状况使俄罗斯的社会学家开始质疑自己的研究志向，并且再次思考他们的专业和道德承诺之间的关系，这是过去在价值中立的掩护下，不用去思考的问题。■

來信寄至：

Svetlana Yaroshenko

<svetayaroshenko@gmail.com>

Elena Zdravomyslova

<zdrav3@yandex.ru>

> 将公共社会学推向 对话社会学

Sari Hanafi,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黎巴嫩, 以及国际社会学会主席(2018-2023)

Michael Burawoy 不仅仅是一位社会理论家, 为社会学提供许多劳动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见解, 他更重塑了世界各地的社会学实践。我一口气就读完整本《公共社会学: 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像是本小说, 这本书分析 Burawoy 过去50年来的历程, 同时提出他支持公共社会学的论述。Burawoy 将他的公共社会学和 Erik Olin Wright 的计划结合, 视这种社会学为道德或规范科学, 主张某些价值观—在乌托邦的面向上—可以被实践以及—在反乌托邦的面向上—它们的实践如何受到阻碍。

Burawoy 借由让公共社会学更有机、更具生产力来理论化它, 以此打造一个致力于公民社会学的真实乌托邦。我无法不同意他的观点, 但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 我想进一步推进讨论, 这不仅是对压迫者最前卫的批评, 也是预想一个与他们对话的可能性。我所谈的「对话社会学」和其理据来自我的学术领域和我的所在地。我在社会学中专长的次领域(知识、文化、宗教和政治)与 Burawoy(劳动、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非常不同。他对抗新自由资本家和第三波市场化的行动者。而我在中东长大, 也仍生活于此: 这里长期受残暴的威权和殖民体制折磨, 酷刑、政治绑架、暗杀和驱逐仍非常普遍。威权政体用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洗脑绝大多数的人民, 让他们相信威权会带来社会稳定, 这该如何应对? 当一些以色列人(大屠杀幸存者的兄弟姐妹们)成为没收巴勒斯坦土地的殖民者, 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以阿冲突? 在缺乏多元转型正义机制的情况下, 我们能进行历史性、修复性的司法吗?

由于 Michael Burawoy 对受支配的人民和其苦难的敏锐觉察, 他坚持, 社会学应该与公

民社会站在一起, 对抗国家和市场的支配。这绝对是重要的, 但我会再加上另外两个目标。

第一个任务是将社会学使命扩展到公民社会之外, 延伸到 Jeffrey Alexander 所提出的公民领域。Alexander 提醒我们, 公民社会只是广阔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领域, 其他领域像是家庭、宗教团体、学术社群和企业组织, 以及地理上连结的地域性社群, 因为它们都生产商品, 并根据不同的理念和限制去建立其中的社会关系。如果我们将自己视为公共领域和自由民主理想的守护者, 这样的扩展对我们的任务而言非常重要。

第二个任务是与不同的非公民领域进行调和: 去参与它们的对话。面对有些人部分地或完全不接受我们推动的理念, 我们需要更认真地去聆听。值得肯定的是, Burawoy 在赞扬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所著的《家乡里的异乡人: 美国右派的愤怒与哀愁》以及她如何跨越「移情之墙」与路易斯安那州的茶党支持者对话时, 他也认知到这件事的重要性。这些人成为 Trump 的支持者, 表达他们对全球化的不满, 和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见解。举例来说, 面对害怕叙利亚和非洲移民的欧洲人们, 让我们在评判他们之前, 先聆听他们。借着我们的规范性方法、前提假设和使命, 我想在此强调我们去与非公民领域对话及调和的能力。我反对激进批判的社会理论, 并呼吁一个情境化批判的社会理论。这是一个在批判权力的同时, 也能够开启与他所批判的力量进行对话的理论。这是社会学的一种方式, 在拥护全盘/古典的自由主义方案时, 也容纳 Rawls 的(增强和修正版本的)政治自由主义; 意即, 在我们的社会中实践多元主义(善的多元概念), 并结合社会中各种多元的社会凝聚力(一致的正义观)。

>>

「公共社会学不只关于公共领域辩论的理性主张或规范论证，也关于对他人情绪的理解以及道德保留。」

更广泛来说，对我而言，公共社会学不只是理性主张，或是在公共领域辩论的规范性论述，它跟情感也有关联：如何理解他人的情绪、他人的道德敏感或道德衰弱，这有时使他们对社会中的苦难视而不见。我相信 Burawoy 会跟我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对话社会学是情感敏锐的，这不仅关乎人们如何在道德上合理化其行为，也是关乎社会学家如何认真看待苦难并接近它。用 Silvia Cataldi 的话来说，它是一种在场的解释学(a hermeneutics of presence)。

谈到道德，在阿拉伯地区，我们的宗教信仰很强大，宗教就是道德的泉源之一。但就像房间里的大象，除了有关政治暴力的讨论，宗教在社会学文献中总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不仅在阿拉伯世界、中东、以色列是如此；宗教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也日趋重要（例如巴西的新五旬节教派）。因此，我认为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应该保持谦卑，并思考如何认知到社会中不同的菁英构成，包括长期被忽略和轻视的宗教人士，他们被反教权主义的社会学家们称为落后、反动的。

最后，Burawoy 的自传(深度剖析书)直接了当的指出，当今社会学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发展乌托邦的愿景；在社会学家备受质疑的时代，这任务并不简单。对 Burawoy 来说，成为社会学者的人们「不是为了变得富有，而是希望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更平等、更自由、更合作的世界(p.2)」。Burawoy不仅透过他的思想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更透过他的实践：慷慨的对待他的学生及广阔的科学社群。我受到他诸多的照顾，因为我并不是从专业和政策社会学走向公共社会学，而是从地方与区域问题的社会学走向全球议题，是他手把手地带领我。此外，他也鼓励我竞逐国际社会学会的执行委员，并担任全国协会副主席和该协会主席。■

來信寄至：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 对 Michael Burawoy 及公共社会学的反思

Margaret Abraham, Hofstra University, 美国



在纽约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
Margaret Abraham拍摄, 2011年。

世界各地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包括社会学者、学术界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女权主义者和有色人种)长期关注对于研究和行动、研究和公共参与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们也致力于处理不平等、种族隔离、剥削、压迫、异化、战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民主、性暴力、社会正义和社会变迁运动等问题。

在美国,社会学投入公共参与的历史很少被谈论,它在社会学的经典中也经常被边缘化。虽然重要的理论家,如 Marx、Weber 和 Durkheim 有非常高的知名度,也因此被视为西方名人,或是社会学界的前驱者、研究者和社会运动参与者;但是 W.E.B. Du Bois、Harriet Martineau、Jane Addams、Anna Julia Cooper、Ida B. Wells-Barnett 和 Marianne Weber 等其他学者,直至今日,大众才对他们有更深入的认识。从历史上看,社会学的核心理论和方法论通常都是由:权力、特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是知识生产、分配和消费体制等等的面向来切入讨论;而有能力支配这些领域的人通常为西方世界、白人以及男

性。这样一来,那些从事公共参与、社会学工作和在领域外工作的重要社会学家,他们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论的贡献很容易就被忽略。

2004年,Michael Burawoy 在美国社会学学会发表演讲时,他(重新)推广了「公共社会学」这个术语。他演讲时除了描述社会学知识的类型(公共、专家、政策和批判)以外,也将公共社会学定义为——社会学的动力,目的是为了促进和保护所有因为结构而造就我们成为现在的样貌的社会关系。而这次的演讲,也激起了在场人士激烈的正反辩论。对我这样一个女性主义运动研究者、处于边缘的社会学家来说,自1990年代以来,我就致力于将家暴问题从私人转变为公共议题;而2004年的年会,绝对是美国社会学学会举办年会以来,最有社会参与性和公共包容性的会议之一。虽然当时参与会议的人士就意识到美国社会学家对社会学公共参与的深刻贡献,还有其他社会问题研讨会和妇女社会学家学会……等学会的贡献;但是,Burawoy 的演讲以及他对于公共社会学的呼吁引起深深的共鸣!它挑战了专业人士的短视近利,并

>>

对社会学知识提出了质疑：这些知识是为了谁、为了什么而产出？

对 Burawoy 来说，社会学是社会变迁的催化剂。而社会学的核心则应该是能发人省思的人文社会学；社会学的目的在于作出有意义的贡献，使我们共同寻求一个更好的世界，同时也努力解决社会问题，让人们需承受的苦难减少。社会学不懈地逐一处理社会排除，以及人们在财富、机会上面临的巨大不平等，还有减缓商品化、市场经济主导世界所造成的现实问题。社会学的使命，即是积极保护社会，以免它走向被市场基本主义支配的状态。Burawoy 试图建立一种公共社会学典范，不只要与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积极合作，更强调学生也是重要公众之一。因为社会学不能局限于社会运动者或是实用主义式的思考模式，同时也需追求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和社会世界的价值观。社会学不仅要把工具性的研究方法视为知识分析的重要手段，更要把关于社会学的目的——反身性，视为知识分析重要的一环。公共社会学应该对于公众的对话有所贡献，其讨论的内容则应该涵括推广某种价值观，讨论群体如何共同实现某项公众目标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无论是公共的、专业的、政策的和批评的，不同知识体系都深深影响着公共社会学；公共社会学牵涉的范围广大，也因此与社会中的各种议题相互依存。

Burawoy 在2004年至2014年间所撰写的论文，内容涉及「公共社会学」的讨论以及「全球社会学运动」概念的发展，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见他在推动概念上的转变轨迹：从创造「公共社会学」这个新名称，试图挑战美国社会学的霸权状况；到后来在关于「全球社会学运动」的讨论中，以更批判性的理解方式、更激进的参与手段，面对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下带来的挑战。也就是说，Burawoy 倡导一种以地方和国家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全球社会学，因为他敏锐地意识到全球北方对知识生产的霸权状态。Burawoy 提醒我们，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幻想，将不可避免地被强国控制，从而使西方成为「新帝国主义利益」的推手。对此，Burawoy 详细说明了新的构想，他期待能将以国家为分界各自发展的社会学，转变为能更顺利对话的区域协会，最终能接轨为全球社会学。《全球对话》即是 Burawoy 在国际社会学学会之下的计划，使我们拥有跨国际的对话和辩论空间，以探讨如何解决当代社会问题。

Burawoy在2004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演讲的将近二十年后、2014年在国际社会学协会发表的十年后，出版了《Public Sociology: Between Utopia and Anti-Utopia》一书。他对社会学的付出，展现于他持续在社会学领域坚持不懈、热情的耕耘，以及他种种具有说服力的发表上。C.W. Mills 认为社会学需仰赖人们生命历程和社会历史的交汇，有了这样的交织才使社会学的重要性被凸显、注目。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女性主义「个人即政治」的说法，来证实上述 Mills 所强调的。Burawoy 对马克思主义做出许多研究和批判，也对 W.E.B. Du Bois 在连结社会学和社会转型方面有多次讚许，并强调这件事对于社会学界的巨大贡献。Burawoy 仔细地将自身经历与他对公共、专业、政策和批判社会学的分析相互交织、连结。他在世界各地的社会学之旅中指出，生活经历是社会学思考的重要元素。这本回忆录细致地讲述了他作为社会学家、学生、研究人员、教师、管理人员、朋友、合作者、社会运动者和学会领导人的个人历程，也呈现出 Burawoy 毕生致力反思和(重新)定位社会学，以应对我们时代的学科和社会挑战。可以说，他反复地辩证、推断并阐释了社会学潜藏的风险和意义。

今日，全球疫情的影响、威权主义和宗教基本主义的兴起，以及假新闻、社交媒体爆炸性增长，甚至是巨量假讯息的消费操纵公众等现象，往往与我们的共同利益相悖。这也促使我们得重新思考，要如何实践社会学。也许，我们将仰赖新一代的社会学者和社会运动参与者，他们将审视历史，透过严谨的理论、对教学和研究的承诺来推动社会学的科学发展，解决持续存在和正在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我们知道，仅仅提出问题和做出解释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借由质疑、设想、提议、追求和管理来扭转不平等的现况。我们需要坚持社会学曾许下的承诺——建立一个更美好、公正和平等的世界。■

來信寄至：

Margaret Abraham

<Margaret.Abraham@Hofstra.edu>

> 思考在地与全球的交织性

Kathy Davis, Free University Amsterdam, 荷兰, 以及 Helma Lutz,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德国



2020年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妇女游行。
来源: risingthermals/flickr。

交织性一词指的是社会结构与身份间的交织与纠缠。这个词是由 Kimberlé Crenshaw 在1989年提出, 此概念使用了十字路口的隐喻: 在这个频繁出入的路口, 不同的性别、性倾向、社会阶级、或种族身份面临不断被碾压的风险。这个隐喻被成功地使用在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分析与辩论上, 因为它能够描述不同形式的社会位置与歧视的交

织。透过取代权力关系中的不同范畴(性别、阶级、与「种族」), 交织性为相关议题开创了新的研究取径: 在洞悉结构所带来的影响的同时, 也在动态的互动过程中捕捉到三种以上的权力与从属关系。

在2001年在德本举办的联合国反种族主义会议上, Crenshaw 对于压迫制度的交织观点在全球引起了共鸣。交织性的概念已不再侷限于其起源的领域——性别研究、批判性种族研究与法律。如今, 他被使用在社会学以及社会工作、健康研究、教育、社会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学研究, 甚至建筑学。在性别研究中, 交织性已成为研究所与大学课程的关键字。专精于交织性的会议、学术特刊与出版书籍随处可见。我们现在能将「交织性研究」视为一个专业领域。

随着交织性的概念从美国传到欧洲, 并在世界各地被采用。在传递的过程中, 概念随着当地情境与历史脉络而有所改变。举例而言, 在欧洲, 种族与宗教成为分析移民人口歧视问题的主要范畴; 而在印度, 「种姓」则是理解社会不平等的重要范畴。最近, 对于如何(或应该如何)将交织性概念化一事, 出现了世代间的差异。「黑人的命也是命」此类近期的运动影响了关于种族议题的辩论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抗争, 推动了交织性领域的改革。

若要理解这样的发展, 我们必须从现在的角度回顾交织性的历史。是什么让批判学者和行动者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交织性的讨论上? 是什么使得交织性的概念不断地自我改良? 最后: 交织性如何在不同目的与不同情势中, 被阐述、修改、调配?

>>

我们正在编写，且即将在2023年出版的《罗德里奇交织性研究手册》将以这些问题为讨论核心。这本手册涵盖了来自国际与跨学科贡献者，对于交织性研究领域的广泛主题。在这期的《全球对话》中，我们请几位作者提供他们各自章节的简易版，用以预览借由交织性来理解社会、文化、与地缘政治不平等的几种不同的方法。Ann Phoenix 透过思考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如何遗害至今，开启了对话的可能，并展示为何这些历史需要成为我们思考全球交织性的一部分。Barbara Giovanna Bello 则持续以交织性的概念来看待当今最重要的两个社会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与「Me too 运动」都源自于美国，后来发展成全球规模的运动。Ethel Tungohan 则向我们展示了交织性对于理解加拿大近年的移民照护劳动者运动的重要性。在这个运动中，不同的社会运动需要联合起来，对抗压迫。回到交织性研究领域内出现的争论，Amund Rake Hoffart 以批判性的视野看待对于纯粹交织性隐喻的追寻，有些学者认为，这将解决交织性概

念的所有问题。Hoffart 抱持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在交织的不平等与权力配置的研究中「需要混乱」。最后，我们(Kathy Davis 和 Helma Lutz)响应国际上对于交织性研究方法上的呼吁，表明「问另一个问题」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能够帮助我们分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抵抗与适应权力的策略。

整体而言，这次的对话展示了交织性对学者与行动者，在当地与全球范围内思考不平等、权力、与社会转型的方法上的影响。■

來信寄至：

Helma Lutz

<lutz@soz.uni-frankfurt.de>

Kathy Davis

<k.e.davis@vu.nl>

> 交织的过去萦绕于交织的未来

Ann Phoenix,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英国



华盛顿特区的一名抗议者手持以乔治·弗洛伊德为主题的标语。来源:Obi - @pixel6propix/[Unsplash](#), 创用CC。

17

现在几乎没有人会质疑——交织性是理解社会关系、日常社会实践以及社会运作方式的重要观点。交织性关切的是人们被置于多重的社会范畴，如性别、性取向、社会阶层和种族化之下的形式，让我们能够分析不平等、权力关系和社会位置的复杂性。交织性理论更指出社会范畴的去中心特质，并解释了社

会范畴之间如何于动态、关系、历史位置等层面中交织。

越来越多社会学家开始将历史的观点纳入研究，以解释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如何构成当代的全球历史。虽然借由这种关注交织性历史位置的理论，能协助我们更好地厘清稳固社会阶层化、

>>



来源: Thomas Willmott/[Unsplash](#),
创用CC。



交织萦绕不仅有助于理解过去,也能对未来行动的规划带来益处。
来源: Hakase/[iStock](#)。

交融和排斥的矛盾过程,但对于历史如何作为交织性的一部分,我们仍然知之甚少。本文认为,历史萦绕于现在(histories haunt the present)的论述,对交织性理论而言非常重要。

> 历史的萦绕

2020年,一名美国警察杀害 George Floyd 的影片曝光后,世界各地抗议种族主义和历史压迫的声浪又重新涌现了出来。这段令人耿耿于怀的历史如何影响当代的社会关系,并在心理社会上以难以预料的形式爆发,也在这起事件后变得显而易见。这股浪潮的复兴吸引了大量人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就人们对 George Floyd 被杀害(白人警察杀害黑人的众多谋杀案之一)的反应看来,种族殖民和奴役的历史在这个社会仍是挥之不去的恶梦。这起事件将焦点放在几世纪以来的种族主义压迫,以及这段压迫历史的象征上,包括奴隶和殖民者的雕像。那些看似埋藏已久、被遗忘或刻意被隐藏的历史,开始萦绕于当代的社会景观。这些重新浮出水面的历史,促成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倾吐个人经历的运动。

历史萦绕(historical haunting)的概念显然并不新鲜。小说和学术作品很早就开始探索这个概念。例如,探讨大屠杀和奴隶制的创伤如何成为跨世代交流的一部分,以及后代的生活如何受到影响。人们对 George Floyd 被谋杀的反应显示,集体历史同时也是个人的,过去的要素很

有可能会回归或持续至今。不仅如此,集体历史对于我们如何想像未来和可能的未来,也是至关重要。

从交织性来看,魂在论(hauntology)增加了分析社会范畴的可能性。魂在论提出了一个疑问:个人历史和国家历史如何在所有社会类别中相互连接和沉淀,从而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和共通点?例如,第三世界的黑人劳工阶级女性代表着什么?要理解这个时间性问题,必须将跨代历史和民族历史结合起来,以避免隐含的本质主义式社会范畴出现。相对地,这也同时鼓励着我们去关注,那段历史如何成为这些国家里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魂在论的交织关注,可以帮助研究者对社会议题提出更具启发性的问题。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我们很快就能意识到,性别、国族、移民身份、社经地位、身心障碍、年龄、居住环境和职业都彼此交织的,从而产生了不平等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从生活条件等方面找到许多解释,这些解释将差异个体化并凸显出文化差异。虽然了解哪些因素与死亡率相关是很重要没错,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研究中所发现的关联性取决于调查的内容,而调查内容又取决于既有的理解。研究中,若提问到会产生特定社会位置和实践的相关历史,或是表达其社会情感背景的问题,很有可能会产生出支持社会正义和刻意介入的分析。这些提问也有可能

>>



迦纳的Sankofa鸟。Sankofa 一词在特维语中的意思是「回到过去，把有用的东西拿出来」。阿肯族人将其描绘成一颗心或一只神话中的鸟，双脚坚定地向前迈进，将喙扭到身后，嘴里吐出珍贵的、未来的生命之蛋。

来源：tatadonets/iStock。

会过度强调交织性下，特定社会位置在第三世界中的不平等。

> 萦绕于交织的未来

现在的交织萦绕是真实存在的，其显示了过去如何成为现在的一部分，以及过去是如何驱动未来的行动。无论是像「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再现，过去的事件于现在爆发；或是成为了一种忧郁、人们避谈的存在；这股萦绕都会使得主体位置产生问题，需要借由生产新的叙事，来促成对未来的新期盼。可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会影响日常实践并渗透到社会关系中，限制或促进未来的可能。当这种萦绕出现在意识中，促使人们对未来采取行动、追求更理想的未来时，一切都可能被触发。交织性有助于解释，特定社会范畴中的人们在意识到那段令人耿耿于怀的历史时，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期待和愿景。

近年来，在许多国家都看到了新的性别／种族化叙事，以回应针对女性或黑人的谋杀案。例如，发生在美国的「#说出她的名字」运动。这项运动想要强调的是，遭警察杀害的黑人女性及儿童并没有像黑人男性被杀害一样，得到应有的关注。因此，如果不去了解世代以及日常实践中累积下来的一系列关系和影响，就难以理解历史对于个人的影响，也很可能会再现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我们必须理解哪些社会情境会对哪些社会范畴造成反响，以及社会定位、情感依附、社会位置和权力关系的相关性，因为这些关系并不一定是那么显而易见。这意味着不能去假设社会范畴仅在被关注或明显运作时才有相关性，也意味着就算是一段被国家承认的历史，也不足以让我们理解交织的萦绕，因为在这些历史背后隐藏着很多东西。沉默的历史渗透到社会当中，透过排除／包容这样日常交织性下的社会关系萦绕于现在。■

来信寄至：

Ann Phoenix

<a.phoenix@ucl.ac.uk>

> 社会运动的交织视角

Barbara Giovanna Bello, University of Milan, 义大利, 以及 ISA 法律社会学研究委员会 (RC12) 董事会成员



来源: Raphael Deindl

黑命攸关和「我也是」运动分别在 2013 年与 2017 年以后风靡全球。由于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上述运动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美国及其它地区的女性和黑人所遭受的持续性和系统性暴力的关注。

Weinstein 丑闻中，名人 Alyssa Milano 呼吁全世界的女性使用「#我也是」标籤分享她们的性虐待经历以后才快速走红。

> 一种「两者／和」的视角

> 起源

黑命攸关是由 Alicia Garza、Patrisse Cullors 及 Opal Tometi 于 2013 年回应凶手 Trayvon Martin 的无罪释放而创立，被认为是同类中首个在网路上展开的运动。此后的运动领袖一直是黑人、女性和酷儿。「我也是」运动则有不同的历史：由黑人社运人士 Tarana Burke 于 2006 年创立并致力于对女性、年轻人、酷儿、跨性别者和来自黑人社区的残障人士的性暴力创伤进行治愈，这项运动是在 2017 年 Harvey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由黑人女性发起的这两项在一开始就有意图交织在一起的运动，在使「两者／和」视角（“both/and” perspective）发挥作用时会面临挑战。我们看到黑人男性社运人士逐渐将自己视为社区的拥护者并成为执法人员种族暴力的主要目标；同一时间，白人女性在没有性虐待威胁的情况下在劳动力市场上提出的竞争要求，似乎佔据了主要的场面；然而黑人女性的声音和经验却不断地缺席。接下来，我将大致说明黑人女性为何消失并反映出一种交织的取径如何有望去纠正这样的情况。

>>

> 社会正义的不平等问题

首先，结构层次上，性别与种族作为独立的范畴享有的不同状态需要更仔细的分析，因为这影响了它们之间与其它范畴在阶级权力关系中的相互作用。黑命攸关运动首先呼吁黑人说出白人至上以及在这种族边界上的暴力再生产问题。保守的反诉，如全命贵以及警察命贵群集，很大程度上缩减了黑人女性以及最弱势黑人对尊严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也是」运动则几乎针对所有女性（超过世界人口的一半）：它寻求消除父权制，但它更围绕黑人女性在没有性暴力威胁的情况进入权力的「房间」——一个对黑人女性来说更难进入的地方——的权利。总的来说，两项运动都提出了社会正义的问题，在做法上却不同。

> 自我延续的特权

其次，美国和国际主流媒体在促进黑人女性的消失方面发挥着作用。对黑人男性的残酷杀害的那些新闻和图像还有他们的遗言——「我无法呼吸」——仍在我们的耳朵和灵魂中响亮，但那些被谋杀的黑人女性却缺席了。类似地，白人女性——无论是否名人——对性虐待的谴责盖过了对「其他」女性的报导。在此种背景下，两项运动都凸显了「阶级」的问题。阶级-种族-性别的棱镜有助于揭示在媒体系统中——白人，包括其女性，更容易引起关注——明确化了的相互构建的特权系统及其透过资讯进行的复制。

这两项观察可能解释为何「我也是」运动在对如何颠覆权力关系以及包容「所有」声音的可能性进行提议的同时，获得的支持更为广泛及其对黑人及少数族群女性经验的轻描淡写。

> 为何我们需要交织性

第三，也有人会认为黑人女性所遭受的谋杀和性虐待过于特殊，以至于无法「普遍地」代表所有女人和黑人的感受。这样看来，交织性的取径具有转变奠基于如下假设——即认为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的暴力只会个别地发生在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身上——之公共论述的潜力。

第四，多元交织性有助于解释社会结构如何促进对身体的支配/从属化，比如在黑命攸关案例中的身体被去人性化，而在「我也是」案例中身

体则被加以利用。将黑人女性描绘为有侵略性的蓝宝石，拥有「超人」力量，或性慾亢进的耶洗别，可能有助于证成对她们滥用国家武力或未经同意的性行为的正当性，并质疑她们的可信度。这种情况也表现在 Weinstein 案件中：在许多谴责中，他特别诋毁了黑人肯尼亚-墨西哥女演员 Lupita Nyong'o。与此同时，将黑人男性描绘成白人女性的「强奸犯」往往会导致毫无根据的指控并将他们过去遭受的私刑合法化，这可能解释了为何黑人男性中有些人不愿意支持「我也是」的座右铭「只相信女人」，而这种抗拒也可能影响他们与黑人女性的团结。

> 前进

最后，作为一种启发式的工具，多元交织性专注于权力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带来的含义，但却是政治决策决定了应该支持谁以及如何支持，正如 [Keisha Lindsay](#) 所强调的。在上述两项运动中，当创始人和其他社运人士都在疯狂地寻求让那些看不见的人被看见，许多运动支持者仍然在进行单方面的斗争：他们的倡议值得更多的媒体与网路关注。因此，「说出她的名字」于 2014 年 12 月由非裔美国人政策论坛以及多元交织性和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发起来解决警察对黑人女性（包括了跨性别和非常规性别女性）；最初的「我也是」以及「我们也是」运动旨在解决针对有色女性、非技术工人和 LGBTQ+ 族群所面对的性虐待问题。

放眼未来，我建议可以更好地利用网路的特性来带出全球的「交织性问题」。如果说网路沟通的跨国性和发挥让目光聚焦在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上，那么它也公然表明了「某人」已然消失于叙事中，并为对「谁」不在那里以及「为何」的即刻反应铺设道路，也为讨论当前的差距提供空间。在这个「虚拟」空间中，黑人命贵和「我也是」可以通过建立联盟来最大化它们的离线和在线的「交织」议程。如果我们回顾美国律师和社运人士 [松田麻里](#) 的话：「如果我们不透过结盟、不透过走出分隔开的地方从而跨越阻碍着我们的那些特权和从属地位来相见那样地参与，那么在历史的这个点上，我们不能富有成效地参与……。」■

來信寄至：

Barbara Giovanna Bello

<barbara.bello@unimi.it>

> 交织的团结与移民照护工作者

Ethel Tungohan, York University, 加拿大

2018年四月，前自由党移民部长Ahmed Hussen宣布加拿大[住家照顾者计划](#)从2020年开始将不在接受永久居留的申请。这项宣布让加拿大移民照护工作者运动所建立的组织感到沮丧。由来自不同社区的行动者以及具有截然不同的规范目标与议程的不同组织所组成的多伦多移居者运动，开始行动了起来。

> 如何让所有移民照护工作者达到永久居留

由不同的移居者组织所参与的一系列会议在多伦多工人行动中心仓促地召开。在同意照顾者应该继续可以在加拿大获得永久居留权以后，运动因在如何满足所有移民照护工作者对永久居留权的需求方面出现了分歧而分裂了。关于应该优先考虑哪些议程以及伴随着的问题都出现了：

是谁在为谁发声？在这场运动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集体能量应该导向法律改革，还是我们也应该同时考虑到迫使移民照护工作者离开家庭来到加拿大工作的结构性不平等？

> 撤回的提案

这些问题还未得到解答且确实还维持着紧张的焦点。然而，照顾者组织成功地对提案上的改变表达了反对的声音，确保了他们的观点成为进行着的对话的一部分。透过媒体发布以及抗议，他们清楚地表明了照护工作是加拿大社会具有价值的一部分，并且那些移民照护工作者——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南半球国家被种族化的工人阶级妇女——是劳动力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积极行动促使了自由党政府撤回提案并且

提供了新的途径让移民照护工作者可以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虽然这些途径仍然与先前照顾者需要在如今已过时了的住家照顾者计划下申请的加拿大公民身份的自动权利相距甚远，然而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仍然保留，而照顾者联盟也因为阻止了完全取消公民权的威胁而松了一口气。

> 交织的视角

当我在四年后的2022年对这些讨论进行回顾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在检视移民照护工作者运动或一般来说的社会运动时，运用此种交织的透镜能够将这些运动中的行动者经常面临的棘手困境摆上台面。

首先，交织性让我们能够真的理解到移民照护工作者运动在考虑其成员所占据的多元且重叠在一起的社会位置来规划一个统一的平台时所面临的挑战。当人们要确认哪些社运人士能够真的代表社运的声音时，便能持续感受到张力的存在，因为面临最大交织劣势的往往就是那些最不具有发言能力的成员。然而，正是这群人的需求可以说才是最紧迫的。这样，此一交织的进路揭示了创立一个要满足其成员们的需求——尤其是那些面临最大挑战者的需求——的运动是多么困难。

其次，交织的透镜也揭示了移民照护工作者运动如何从他们交织的取径中获益。将自己定义为交织性的移民照护工作者会向拥有不同类型会员的运动寻求联合。他们经常与劳工运动与女性运动形成联盟。作为移民照护工作者他们发现到他们的公民身份申请会因为自己或

「用交织性来分析这些运动，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移民照护劳工的流动性。」

家人患有残疾而被拒绝，因此他们也会向残疾正义运动寻求联合。与这些不同运动合作的机会促使移民照护工作者的关怀得到更广泛的牵引力。正如 Fernando Tormos-Aponte 与我在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建立交织团结的能力使不同的社群能够看到他们的命运是彼此关联的。作为移民照护工作者运动的一部分的进步组织——与其它社会运动——一起发现到，他们可以透过共同参与到关键运动和具影响力的公共论述中来合力消解压迫。

> 废除或改革

当然，来自不同运动的行动者在同一个规范性的议程中将产生的冲突会是一个问题。在此，交织的透镜被证明是有启发性的。一些移民照护工作者组织相信，与康巴西河共同体在一交织的愿景中是和谐的，这个愿景就是应该将运动终极地推进到废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父权制相互连结的权力结构的地步。然而其它组织则认为他们的努力最好用在寻求政策的改动。在我即将出版的书，《Care Activism: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Movement-Building and Communities of Care》中，我将这些分歧归类为废除与改革两个主要范畴：一些组织将促进废除主义的愿景当作运动的成功，而另一些组织则将政策的改动视为运动的成功。

> 疫情带来的影响

疫情颠覆了许多意识形态分歧，这使交织性的分析变得更为突出。当我仍认为不同组织的规范性愿景最终是根据于意识形态的时候，使用多元交织的概念来分析这些运动却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到移民照护工作者运动所采取的取径的流动性。多元交织性，透过强调对权力进行多元向度的分析，辨识权力在过程、系统和结构中的变化如何缩小和影响个人经验，从而显示新冠疫情如何对移民照护工作者造成灾难性的影响：随之而来的国家政策变化和工作场所的环境是毁灭性的。

这次的疫情是加拿大移民照护工作者运动的分水岭，揭示了该运动内部行动主义的急迫性。许多在2018年还采取不同立场的类似组织在疫情期间齐聚一堂除了呼吁对能够支持移民照护工作者的政策进行改进，也带着如下目的：引向更持久的结构性变革，此变革能够使照护成为基本社会价值的中心舞台。此外疫情也导致了移民照护工作者运动的行动者重新考虑与土著运动、黑命攸关以及其它进步的社会运动形成联盟的重要性。当看到他们彼此的命运与其它少数群体不可逆转地连结在一起让他们更深刻地领会到交织团结的必要性。■

來信寄至：

Ethel Tungohan

<tungohan@yorku.ca>

> 寻找交织性的正确隐喻

Amund Rake Hoffart · University of Oslo · 挪威



交织点常被以公路与十字路口表示。
来源:Jeremy Bishop/[Unsplash](#)。

语言，无论是日常或是学术形式上，都充满了隐喻。如果你开始在文本中寻找隐喻，会发现它们俯拾即是。隐喻使用转译的方式：改变词语原有的表达方式，以此描绘其他事物。诸如：心碎(broken heart)、害群之马(bad apple)、道德罗盘(moral compass)、大器晚成(late bloomers)、双刃剑(double-edged swords)等隐喻，运用了平凡生活中的物品，将它们转化为全新、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意义。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术语言中可以找到大量的隐喻这点看来，就可以说明为什么隐喻是我们「赖以维生」的东西，而这正如同 George Lakoff 和 Mark Johnson 在 1980 年的经典著作

中所提到的隐喻那样。这绝非语言的边缘现象，而是属于诗歌和修辞领域的超凡事物。隐喻就是这样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思考和行为。

> Crenshaw 的道路交叉口

Kimberlé Crenshaw 1989 年的文章「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透过道路交叉口的隐喻描述了交织性的概念。Kimberlé 将黑人女性受到歧视的经验，形容成像是被来自不

>>

同方向的车辆碾过一样。Kimberlé 带来了这项想像力十足的意象，而这也帮助她分析美国的法律案件。案件中的那些黑人女性，当时是被美国的反歧视理论忽视的。尽管道路交叉口从此成为交织性的中心形象，但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大多数反对意见的砲火都集中在道路交叉口这个意象的叠加概念上：其将社会范畴（如性别、种族、阶级和性）描绘成是分离且彼此独立的东西，从而使它们可以互相交叠。似乎很难否认道路交叉口的意象是可以叠加的，因为其分开了不同通过交叉口的独立道路。在 Kimberlé 的文章发表后的三十年内，已经有大量——越来越古怪——的替代性比喻被提出。因此，这也成为了交织性被散播的重要形式之一：通过隐喻和类比不断地被赋予其新的解释和诠释，这个概念已经被远远地散播出去了。

> 异曲同工之妙！

有趣的是，有一些交织性的替代性比喻比原本想取代的道路交叉口还要抽象，例如，轴、干扰、配置、组合、分形、间隙、向量、地形和失序空间的湧现。对于那些想用更具体的东西来当作比喻的人来说，烹饪和烘焙显然是一个发挥灵感的好地方，因为交织性曾被比喻成是糖、饼干、千层蛋糕、大理石蛋糕中的漩涡、面糊和炖菜。对于想寻找比交织性更好的比喻的学者来说，烹饪和饮食就非常地诱人：成分融合、混合和相互流动的方式；部分变成整体，整体变成部分；将不同的成分混合在一起，有时溢出一部分，有时被放进嘴里咀嚼。一个拿食物作比喻的例子是 Shannon Sullivan 的炖菜，这个概念在她 2001 年的著作《Living Across and Through Skins》中被提出。与起司火锅(fondue)不同的是，起司火锅里的食材会融化在汤里；但是 Sullivan 炖菜里的蔬菜会在锅里保留了其「身份」，同时又会与其他蔬菜相互作用发生变化。这个概念将炖菜比喻为一种交织的社会关系和身份，锅中的蔬菜则是代表个人社会身份中不同部分之间的动态和相互形塑的关系，例如种族、性别、阶级、性、年龄、身心障碍等等。

> 混乱的山间道路交叉口

一些学者持续研究道路和交叉口的交通形象。在 Ann Garry 2011 年的文章「Intersectionality, Metaphors, and the Multiplicity of Gender」中，她勾勒出在道路交叉口上逐步添加元素的过程。这些元素建立在 Crenshaw 最初的隐喻之上，但同时又更加复杂。为了使其更具流动性、更好地捕捉压迫体制彻底混合的样貌，Garry 添加了街道、汽车和一个圆环。尽管如此，这些添加的元素仍然无法弥补交通路口二维空间的限制。因此，若要超越交通圆环的平面结构，需要的是一个垂直的元素来表示特权和压迫的结构如何相互连结。关于这一点，Garry 使用了山脉，还引入了流态的液体来点缀山的形象。当然，动机是要确保整个图像要具有流动性，而不是固态且离散的。Garry 最后的成果是这样：液体从山上流向道路交叉处，交叉处的中心还有一个圆环，许多街道和汽车在这里交汇。或许这个图像看起来很混乱，但 Garry 向我们保证，这种混乱正是我们在隐喻中所需要的，因为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交织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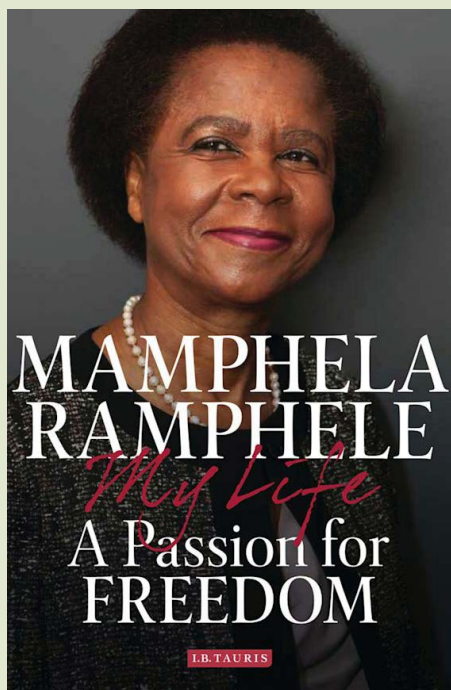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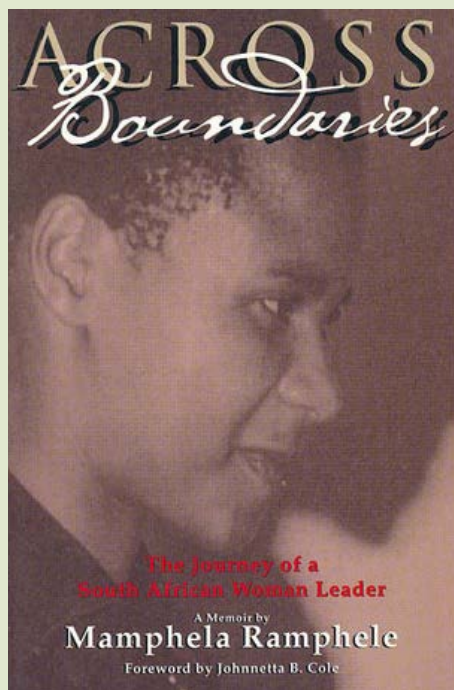
> 根本没有纯粹的混乱

是什么推动了人们去探索这种交织性的替代性比喻？对交织性中心形象的普遍不满，似乎驱动了人们去修正或是追求新的比喻方式。交叉口的比喻根本不符合要求，因为其过于依赖单独要素的可叠加性。也就是说，交织性的「正确」隐喻必须要不受要素叠加下的污染影响。在这一点上，我想起了 Garry 坚持交织性的隐喻需要混乱。然而，矛盾的是，交织性的正确比喻追求的似乎是一种不纯粹的「纯粹版本」。也就是说，这是在尝试创造出一个没有被叠加要素污染的隐喻。我认为，追求这种纯粹的理想似乎是为了站在混乱的对立面，而且这种方式很可能会约束我们想法和隐喻上的想像力。为何不尝试去思考看看那些隐喻中「需不需要混乱」，而是要我们去承认那些思考上的叠加构面，还要把它们当作一种潜在的资源，而不是一种难堪的事物？■

來信寄至：
Amund Rake Hoffart
<a.r.hoffart@stk.uio.no>

> 交织性作为批判方法

Kathy Davis, Free University Amsterdam, 荷兰, Helma Lutz,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德国



来源:纽约市立大学女性主义出版社。

来源:I.B. Tauris。

尽管许多性别研究的学者都认同,交织性是好的女性主义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但我们仍不清楚交织性要怎么运用在研究中。在实务上,交织性引伸出许多问题,例如:哪些范畴属于交织性分析?研究者必须紧贴着性别、种族、阶级这「三大面向」,或者他们可以探究更大的网路?有些研究者也疑惑,是否无论如何都要运用范畴,然而他们可能因此被误导,或无法捕捉到更广泛的经验现象与身份认同。

> 如何运用交织性

美国学者 Mari Matsuda 提出一个简单的交织性分析程序,她把它称作「提出另一个问题」:当我看到似乎是种族主义的议题时,我问「其中的父权体制在哪?」;当我看到似乎是性别歧视的议题时,我问「其中的异性恋在哪?」;当我看到似乎是恐惧同性恋者的议题时,我问「其中的阶级利益在哪?」。这个程序惊人的简单,但对

于分析交织的权力如何在人们的生命故事中运作,以及分析交织可以如何形成赋权或限制,却非常实用。

> 在重重的抗争下能如何看待自由

举例来说,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分析 Mamphela Ramphele 的生命故事,她是南非一位著名的医生、作家及反种族隔离运动者。她曾被监禁,她的著作也被禁止许久,但她后来成为第一位领导南非大学的黑人女性、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以及2014年1大选中民主联盟的总统候选人。我们用三种方式「提出另一个问题」:(a) 在分析之前,认知到我们作为研究者的定位;(b) 发现分析过程中出现的盲点;(c) 复杂化对权力关系的思考。

(a) 延续 Donna Haraway 著名的论点,(女性主义)研究者必须承认自己正在生产的知识永远是有特定位置、不完全的和具反身性的。我

>>

们认知到自身是在反种族主义进程下的白人、女性主义者和来自欧美的研究者，我们想分析 Ramphele 自传的这件事，并不是在真空条件下发生的。我们批判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中忽视种族和种族主义，所以期待 Ramphele 的生命故事能帮助我们的研究计划，即证明不可能在不讨论种族的情况下讨论性别。起初，我们有些惊讶，因为她似乎不愿意在种族隔离的背景下将自己定位成非洲黑人，或者谈论自己所经历过的种族歧视。她甚至借由标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及所处的优势地位，刻意地跟种族和种族主义保持距离。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访谈的过程中，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女性」对她而言似乎比较舒服。正是她对性别的重复强调，让我们停下脚步，并意识到我们需要重新检视研究蓝图。

(b) 借由再次「提出另一个问题」，我们更加仔细的思索那些 Ramphele 坚称「性别不平等与性别歧视才是她背后的驱动力」的时刻。我们假定，在种族隔离政策之下，种族主义会是影响她生命的最显着因素；相对于此，Ramphele 不断以父权结构下的性别关系来解释她的一生。她的叙事策略能帮助她建立自己的特殊地位，在种族分歧的南非，强调性别认同更能够做到这件事。她没有将自己定位成一个黑人女性或南非人，而是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女儿、一个姐妹，要对抗男性和男性主导的体制，因为这限制她去实践自己想做的事。借此，她建立了自己的特殊性：跟她的家人、朋友、同事和同志有所不同。

(c) 借由「提出另一个问题」，我们能够理解 Ramphele 决心将自己展现为一个思想独立的女性。她想要战胜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规范性限制，而这也成为她人生成就的基础，作为一位白手起家的学者、社会运动者、专业人士和单身母亲。她聚焦在她自己完成的事情上（而不是，举例来说，作为著名的黑人人权运动者 Steve Biko 的恋人），并且，她不断强调，不止是种族、种族隔离的国家或是黑人意识运动形塑她对自己的认同。她说明她生命中的不同视角和社会定位如何在某些时刻变得清晰，因为在某些情境下她更认识

自己。例如，她反对非洲民族议会（ANC，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非洲政党）将对抗种族主义抗争置于女权运动之上：

「你不能拥有被分割的自由。我就问，如果我作为自由的黑人但仍受困于女性的身份中，我要如何视自己为一个自由人？我不可能把自己切分成『我体内的女人』跟『我体内的黑人』。如果你想要讨论我的自由，就必须整合地看待。」

在这个交织性思维的美妙举例中，她将性别和种族结合，清楚地表明，对她而言，自由取决于两种斗争的整合。

> 日常策略如何让我们抵抗或调节权力

「提出另一个问题」的方法帮助我们在看待 Ramphele 的自传时能带着交织性的意识。这使我们可以批判性地检视我们的假定和社会位置，意识到我们的盲点如何阻碍访谈分析，并揭示出受访者自身如何借由一种交织的理解，包括性别、种族和其他社会差异，重构出一个对她而言有意义的生命叙事。交织性的使用不仅限于研究者、社会学者、女性主义者和批判种族理论学者；常民也会使用它。在分析交织性时，我们需要注意人们如何在不同脉络下、不同生命时刻中定位自己。这意味者，我们要认知到，脆弱性在不同情境下可能不同或不相似。并且，我们应着眼于个体如何发展策略——通常相当足智多谋——来减缓或抵销这些脆弱性。最重要的是，仔细观察人们用来抵抗或调节权力的日常策略，它很可能比我们预期的更加复杂和矛盾。■

来信寄至：

Kathy Davis <k.e.davis@vu.nl>

Helma Lutz <lutz@soz.uni-frankfurt.de>

1. 此分析是奠基于 Mary Marshall Clark 所做的访谈，她是我们的同事，也是前民权运动者及口述历史学家。同时，此分析也参考 Ramphele 本人撰写的几本自传。

> 周五为未来而战：社会运动的观点

Koichi Hasegawa, Shokei Gakuin University, 日本, 以及国际社会学会和环境与社会委员会(RC24)成员



大图:全球气候正义行动日。2021年11月6日,10万人在格拉斯哥参加了COP26的气候游行。

来源:Hanae Takahashi(日本地球之友)。

小图:2021年11月6日,伦敦的气候游行。

来源:Amelia Collins(国际地球之友)。

周五为未来而战是一个致力于气候变迁议题的年轻人网路,尽管新冠疫情期间难以举办大型的线下活动,但它依旧很活跃。2021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所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期间,约有十万人为了求联合国对气候危机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而上街游行。在2019年9月中旬,这个运动成功动员了全球超过760万名年轻人,打破了街头运动参与者人数的世界纪录。我们能够将此视为世上最成功的一次集体行动。而我们想知道为何这些运动有如此卓越的成绩。然而,尽管运动在全球取得了成功,但与其他地方的迅速增长相比,日本参与这些活动的人数相对较少、成长速度也较缓慢。为何在日本这些运动动员的参与人数、发起街头运动的城市数量、与在国家与地方层面,对媒体与政府的影响如此有限?本文从社会

运动的角度,关注于文化构框、动员资源与政治机会的结构,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些答案。

> 周五为未来而战:最成功的集体行动

周五为未来而战起源于2018年8月20日,当时15岁的瑞典女孩 Greta Thunberg 独自在瑞典议会前发起抗议活动。这天是瑞典新学期的第一天,当时也正值大选期间。她原定要持续罢课三周直到9月7日(周五)大选结束。以期盼政府加强应对气候变迁的措施为诉求,她以罢课的方式发起了一连串的「气候罢课」或「学校罢课」,这项运动快速地借由社群网路(SNS)与海外媒体报导传播开来。Greta 的抗议行动意外地获得了巨大的回响,这使他决定在大选后的每周五继续罢课,直到瑞典政府采取更积极

的行动，履行2015年所签订的《巴黎协议》。他在2018年11月的TED演说与他在同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所举办的演说都得到了高度的讚扬，气候罢课迅速在全球蔓延，成为「周五为未来而战」运动。

2019年5月15日(周五)，在Greta第一次抗议的七个月后，这个运动已扩展到包括全球125个国家、2000多个城市当中的140多万人共同参与，这些参与者主要都是年轻人。抗议开始后的第十三个月，2019年9月20日(周五)，也就是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在9月23日的开幕前，已有163个国家的400多万人参与了这个抗议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27日(周五)，在8天内，共有来自185个国家的760多万人参与。在大多数国家，许多年轻人都自发性地参加了这场街头游行。

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就任何议题或任何领域所采取的最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在Greta发起的行动前，最大规模的气候变迁游行是在2014年9月联合国气候变迁特别会议召开前的纽约，当时大约有40万人参加游行。

在2020年，由于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大多数国家都对街头行动有严格的限制。但在2020年9月25日(周五)，这天被周五为未来而战等组织称为「全球气候行动日」，尽管疫情蔓延，在世界各地依旧有高达3200个地点采取相关行动。在德国，共有20万人在450个地点发起街头行动。

与世界各地迅速高涨的参与相比，日本的活动参与人数较少，获得支持的速度也很缓慢。2019年3月15日的抗议活动在日本仅有200人参与，也只有东京与京都两个城市响应。2019年9月20日举办的名为「全球气候大游行」的游行活动有超过5000人参与，这些人来自23个县的27个城市。其中大约有3000人参加东京奥运，为了让人们更容易参与这个行动，他们使用「游行」(march)来取代「罢课」(strike)、「行动」(action)等用词。

这场活动有几个特点很有趣：一、它主要是由年轻世代，如高中生和大学生参与的集体行动所组成；二、大多数参与者都是第一次参加，过往从没有过任何社会运动或示威行动的经验；三、年轻人为了加强应对气候变迁的措施的诉求而罢课、上街游行的行为，在本质上是无私

的；四、这并非一次性的活动，而是某周五持续进行，即使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全球也已多次举行这个活动。这个运动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包括在发展中的国家；六、社群网路是这个运动用以动员人们参与活动的重要工具；七、这是一个只关注气候变迁议题的活动。

> 借由文化构框、动员结构与政治机会结构分析

我用以分析社会运动的框架：社会运动的三角模型(TRIM)是立基于 [McAdam \(1996\)](#) 的研究，其中包含三个元素——文化构框、动员结构与政治机会结构([Hasegawa 2018](#))。文化构框定义了所有参与者共享的共同处境：运动中的世界意象与自我意象，其正当化了社会运动与活动，同时能够激励公民的参与。文化构框是一个动态的、战略性的过程，调解人们的不满，并走向变革。动员结构的重点在于什么条件下能够动用什么资源。得以调动的各种资源，如人力、财力、物力与讯息，以及合法性或正当性等象征资源。最后，政治机会结构是整个制度与非制度的政治条件，它定义了社会运动的出现、发展、摔落等社会过程。

这是一个整合了集体行为观点、新社会运动理论与资源动员观点的分析框架。这是对「社会运动与文化」、「社会运动与组织」、「社会运动与政治」三个领域的回应。

「周五为未来而战」这个名字与Greta Thunberg 的标志性形象非常有效。过去人们认为，尽管在围绕着气候变迁议题形成的运动中，有一些得以长期存在的象征符号，例如北极熊，但关键人物很难在多年间都保有强而有力的象征意义。过往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人物，只有200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前副总统 Al Gore。在将气候变迁议题个人化的层面，Thunberg 的出现极为重要。在2019年，她受邀参加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2月的欧盟议会与9月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她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令人印象深刻。在同年12月，她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

周五为未来而战——只发生在Greta为抗议所定的目标日：周五——是一个很好的框架。就像 #MeToo 运动一样，这些单字、短句都很简单，在使用英语的国家里面，连国小学生都能

>>

理解。它所表达的讯息也很清晰、积极，它是未来导向的。虽然只有16个字母，但却表达了对未来的危机感，呼吁大家在周五有所行动。它也很容易缩写或做成标籤，例如 #FFF仙台：就像「周五为京都的未来而战」、或「周五为神户的未来而战」一样，我们不仅可以加上国家名，还可以加上当地地名。因为容易本地化，年轻人能够轻易在各地围绕这个主题组织起来。在日本，周五为未来而战的三十多个团体在各地持续进行抗议行动。「周五为未来而战」这样的标语，与负面的、禁止的或被动的框架——如「相对的」、「反XX」、「不要XX」——相比，不太会引起抗拒或排斥。同时，它也让大家对「周五为未来而战」的内容感兴趣。

在动员结构方面，诸如绿色和平、地球之友、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知名的环境NGO已经退居幕后。确实有既有的环保NGO成员及其秘书处的全职人员加入运动或提供一些协助；但基本上，这个运动不依赖于组织的基础。年轻人以「在周五为未来而战」之名面对气候危机，是这个框架成功最好的证明。

年轻人使用社群网路交流讯息与动员。Greta 的推特帐号有505万粉丝（截至2022年6月底）。他的脸书也有355万粉丝。她在脸书上的大部分文章都有一万多个讚，有些甚至超过十万。Greta 良好的连结外部的观念、提出问题的能力、和一致的态度是人们在思考如何动员时很值得学习的东西。

从政治机会来说，2019年这个时间点，对于人们响应 Greta 的行动至关重要。2019年是《巴黎协议》开始施行的前一年，这样的运动很容易受媒体关注。如果行动发生在2012年，它可能无法得到相同的回应。

在2019年5月，世界上报导气候变迁最热烈的英国《卫报》表示，「气候变迁」这个名词并未完整传达出当今现实的严重性。该组织公布了一项政策变化，随后开始将这样的情况称为气候危机或气候紧急情况。

Greta 的行动展现出了持续性。2022年6月17日，学校的罢课来到第200周，以一年52周来算，行动已经持续四年。

> 日本：为何这个运动如此受限

日本的周五为未来而战运动，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极度受限的。为什么他们动员的参与人数如此有限呢？

日本的年轻群体使用未翻译过的「周五为未来而战」。即便这是一个直白的标语，但在与日语中很难表达，没有人能想出一个适当的日语版本的标语。同样的，日本没有一个像 Greta 这样的象征性角色。在日本，年轻人普遍沉默、愤世嫉俗或漠不关心，而街头运动的参与者多是外国人或国际学校的学生。即使只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日本社会运动的政治成就也相形见绌；与韩国、台湾、香港、菲律宾等地相比，日本的社会运动在资金、人力、组织基础、专家参与等各方面都显得薄弱。他们的动能不足是因为社会运动的文化框架、动员资源与政治基础都非常薄弱。最终，动员的扩大将会到极限，在不断重复行动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面临政治效力的减弱感与无力感，也可能看不到这些行动的任何效果。如何维持持续重复同样的行动时所需要的能量，以及如何在参与者的新鲜感与媒体报导逐渐消失的情况下持续活动，都将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从政治机会结构来说，青年群体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政治途径，去促成更激进的气候政策。在抗议活动之后，没有任何具体的政治方案或议程被提出。周五为未来而战的倡议者应该如何构思新的方向？下一步该怎么走？政治上有哪些盟友？这些都还没有答案。倡议活动引发的动盪，最终也没有使相关阵营在国家层级的选举中胜利。受限于倡议者的组织背景，发挥实际的政治影响力仍很困难。在民族中心主义、民粹主义带来的政治反弹，以及大众媒体造成的政治压力之下，日本公民社会与倡议者处理气候变迁议题的路途，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未来的走向还很难说。这可能不仅是日本周五为未来而战运动的问题，也是海外社会运动的共同问题。不过，尤其在日本的政治文化下，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不太可能增加——如何维持运动并取得进展，仍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來信寄至：

Koichi Hasegawa

<k_hasegawa@shokei.ac.jp>

> 乌俄战争如何影响社会学

Nataliya Chernysh, Ivan Franko Lviv National University, 乌克兰

在乌克兰社会学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演讲¹中,我曾定义全球化脉络下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三阶段。结构上,每个阶段由七个部分组成,我认为这些极为重要,尤其为了了解其特定发展趋势:社会学在特定时间中的本质、其所定义的特征、基础概念、核心议题、主要功能、主要特征和在实证研究中采用的主要方法。

> 全球化的社会学

阶段一:全球化前的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萌芽至1985年),当第一个社会学工作在此领域出现时,社会学被认为是社会的科学;其模糊的想像来自于西方社会内部的领土和民族国家边界。2000年时,U. Beck 曾以「容器」社会学称之。此时期为社会学正典成形的阶段。

阶段二(1985-2002):由于影响力巨大的全球化的发展,社会学此时转变为人文学科;而全球化的兴起亦是它跟随西方模式而产生的,精确一点地说是美国化(特定的例子如:其他国家面临的麦当劳化的状况)。这就是为何P. Berger 称美国人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此阶段的社会学正典仍持续成形中。

阶段三(2002-2016):多元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学(东方化的出现、另类全球化等)此时全球社会学已臻至完备,转变为以多元方式全球化的人文科学。其中,如M. Burawoy说,地方仍有其存在的必要,且他们能代表不同国族学派与「富裕的北方社会学」在社会学社群中对话。从而,社会学正典外有更多的社会学工作正快速地扩张。

阶段四(2016-现在):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学;因为全球化进程的趋缓以及世界区域化的状况以离心的方式增强。(于此注记,我使用「后全球化」这一术语是来自于D. Bell「后工业化」的比喻,其与取代工业社会但保留前工业和工业部门的社会类型有关)。因此,社会学在此时期变成一门驳杂伴随着区域形态而生的人文科学,而经典和非经典作品形成具有对话性和强烈跨学科性的语料库。

> 全球化社会学的现状?

这四个阶段并不能表明全球化进程的消失等与全球化社会学的衰退。反而是意味着新的社会文化现实的出现,与在全球化情境退场下社会学知识的重新配置。举例来说,新冠疫情的出现导致全球关系及联系的瓦解、边界的再现,或反映越来越多社会学家在工作上实体跨国合作数量的缩减。

后全球化时代在乌俄战争进行的此时此刻肩负了一个新的认同。今日,我们正见证一个世界新秩序的诞生,可以解释成对于西方的复返(此新形式可以称为「团结西方集体」)与乌克兰的沆瀣一气。就我来看,今天全球化与地方并无对立,也无促使地方转变为全球的张力。此处,地方朝全球中心成长,地方跃升成为全球的核心。换句话说,透过乌克兰的案例,我们看见普世价值体现在非西方世界对这些价值观的斗争中,有一种新型的全球/地方模式诞生了。它们的特点是对政府的影响极其强大,并且缩短了决策时间。新的区域联盟开始扮演特殊的角色,有时在没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之间(我指的是「小联盟」,

>>

「如今在地性朝全球性生长,在地性也渐渐成为全球性的核心。」

例如英国-乌克兰-波兰,或三国联合:乌克兰-摩尔多瓦-乔治亚)。

当然,这些过程也需要社会学反思和讨论,不同国家学派和社会运动的代表之间需要进行对话。例如,乌俄战争已经具有社会学意义。我指的是 ISA 主席 [Sari Hanafi 的一封信](#),信中描述了普丁的帝国典范,并强调了这场中东战争的四个教训。总体来说,我同意该文本中的许多论点,但同时我认为直接将中东战争与乌克兰当前的战争进行比较是不正确的,乌克兰人民正在遭受种族灭绝。每场战争都是可怕的,如果我们不共同努力摧毁一个基于帝国模式的政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不仅对乌克兰本身构成威胁,同样对世界上许多国家造成威胁。

> 社会学将往何处去?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我在本文列出的阶段来建立当今社会学的趋势。暂定列表可以包含下列10个概念:

- (1)社会学的边界、主题和研究对象的迅速拓展是由于该学科领域的渗透,以及与人工实境相关现象的社会学的反思(虚拟现实、扩增实境、人工智能等);
- (2)发展和培养具有混合性质多维度与多功能的社会学反思性,其任务是生产具有一系列全球、区域或本土的复杂自我调节系统的概念和模型以在社会中实践;
- (3)从跨领域(interdisciplinarity)到跨领域(transdisciplinarity)的转变以及出现了基于跨领域融合整体思维的后设理论;
- (4)区域发展计划的概念化以及地方、全球、全球在地化、非全球、后全球进程和现象共生问题的重要性与时俱增;

(5)学科术语显着的复杂性反映在来自社会和自然科学,以及科技和人文学科术语使用混合数量的增加,且伴随着后古典和非后古典社会学概念的综合;

(6)社会学家的注意力从静态转变为动态,甚至是反动的社会变革;

(7)研究复杂(非物质的)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体现在特别关注社会紧张局势中新形式的不平等,以及对立利益和价值观新形态的冲突;

(8)现代社会学的理论和认知功能在高能(或超动力)和反动的社会转型条件下日益重要,以及人道主义不断引入新技术和混合战争,导致当前的逐渐去人性化的状况;

(9)通过使用新合成和修改的定量和定性方法,以及采用其他学科的方法,使社会学学术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多样化。这些综合的影响使社会学家能够获得快速有效的社会结果;

(10)社会学研究从口语和非口语方法转向使用数位技术等。■

來信寄至:

Nataliya Chernysh

<nchernysh@gmail.com>

1. Nataliya Chernysh (十月 2017) <Sociology today –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for development> <http://stmm.in.ua/archive/ukr/2017-4/4.pdf> (俄文)。

> 集体与个人创伤

Yuriy Pachkovskyy, Ivan Frank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viv, 乌克兰



来源: Nastyao-fly/Depositphotos。

持续进行的乌俄战争是对整体公民社会的挑战。从乌克兰的现况，我们可以观察到国与国之间共存准则的崩坏，以及人类命运是如何被掌握在唯意志论和一个拥有帝国野心的国家中；或者，事实上是掌握在一个试图将其厌世的理念宣扬到全世界的国家领导人手中。现今乌克兰人正在经历的恐惧也同样影响了全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备受挑战，尤其是针对俄罗斯核子武器带来的威胁，和面临移民、全球饥饿、能源和环境危机等。与乌克兰人现在正在经历的大屠杀悲剧，上述问题或许不足挂齿。根据官方统计，在战争的前115天，俄罗斯在乌克兰杀害的幼童人数超过2021年叙利亚和1992-1995年间波士尼亚被杀害的孩童数¹。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我反思战争带来的后果和问题，并想到了几个符合社会创伤(P. Sztompka, J.C. Alexander, R. Eyerman等)概念的类比和比较：战争作为全球一同面对的挑战、战争渗透进人类的命运、战争作为一种创造和建构新的人类存在意义的方法、战争作为烦恼和生命经验、战争作为人类活动和强化精神的时空、战争作为个人未来发展的阻碍和世代的宿命、战争作为大屠杀的方法、战争作为团结的途径等。上述皆仍持续发生。然而，让这些事情与战争结合的，大部分是因为我们需要方法度过一个影响生活和整体社会的创伤事件。每一个历经战争的人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生命故事，这些故事

都和他们的出生地、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以及他们创造的历史纠缠和连结在一起。

乌克兰的历史就像一只带着伤飞行的小鸟，挣扎着想要飞得更高，飞到黑暗与不确定之外并迎接光明。在这过程中，乌克兰遭逢许多历史创伤(例如：二十世纪早期的事件很值得提起，当时乌克兰正努力着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下的俄罗斯中独立。1930年代的乌克兰大饥荒、1941-1945德国纳粹带来的灾难、1986年的车诺比核灾，以及从2014年持续至今的乌俄战争，并导致克里米亚、部分的顿涅茨克州和卢汉斯克州被俄罗斯佔领。)和二十世纪晚期以及二十一世纪早期的社会文化性创伤，它源自于长时间的社会变迁、旧的价值体系的在2004年橘色革命期间争取民主的过程中瓦解以及在2013-2014年尊严革命时期对欧洲国家设下的阻碍。挣扎和受苦的漫长历史经验已经被刻划在乌克兰人的社会记忆中，深刻的情绪经验造成群体和个人的情绪创伤。根据乌克兰卫生部，有超过一千五百万的乌克兰人将因为现在全面的战争而需要接受心理辅导，三到四百万人需要药物治疗精神疾病。五个人之中至少有一个乌克兰人因为战争而健康受影响，尚未平息的战争让越来越多人心理状况出问题²。

有鉴于乌克兰人的经验，现下的战争对现实产生了新的见解。大部分的乌克兰人已经打破过去因为卫国战争和战后经济重建而建立起的「乌俄兄弟情」迷思。「我们并不一样」的想法变得普遍，即使对于那些不愿否认两国拥有共同斯拉夫血统的乌克兰人而言也是如此。这份认同可以追溯到对战争看法的不同。对于我们乌克兰人而言，战争是为了争取自由、尊严和生存环境(对俄罗斯人来说，这并不叫战争，而是特殊行动：英雄化他们嗜血的领导人，并且厌恶每个乌克兰人)对乌克兰人来说，这场战争是个极度创伤的事件，但对他们而言，这却是一个极度狂喜的时刻，也是大众意识中符号Z和V的胜利。因为战争产生的新生活型态使乌克兰人需要付出很大的心力，挣扎并巩固着，就如同它对整个民主社会造成的影响，特别是欧洲社会，无一例外。

>>

意料之外的期待是这次战争带来的特殊悲剧。我们生活在国家东部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之下，战争已持续长达八年之久，并且对战争的（错误）认知已经停留在每个乌克兰人心中。2022年2月24日来到了我们新的故事的倒数阶段，当大人们扪心自问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会想要回到苏联吗（USSR）？」或是换个方式问：「我会想要生活在一个尊重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吗？」新的倒数是，发现国家的命运在前5到7天，当俄罗斯大举入侵1000公里的乌俄边境时就被决定，所带来的惊讶（因创伤事件而起的情绪状态）。我请利沃夫大学社会学院的学生们描述（重建）他们对战争开始至今三个月的感觉。对他们来说最强烈的感受都与战争的第一天有关：

「对我来说，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就像我将要去一场爱人的丧礼。大家都害怕。在战争的头几天，我很怕出门，整天都躺在床上看新闻。到了战争的第三天，我第一次踏出家门，并且和朋友去买面包。商店内排队的队伍很长，摆放民生用品的架上几乎被扫空。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和害怕。」（Vira，19岁）

「战争宣布开始的那天晚上对我来说很漫长，每一台从家里旁边经过的车子都好像直升机或火箭，因为这样再加上持续感受到的压力，让我无法入眠…」（Dmytro，21岁）

“「第一天晚上大概是最糟的。因为大到无法想像的压力，导致我开始失眠，我成天都在看新闻，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这让我感到恐慌。大约在凌晨三点的时候，三台战斗机飞过我家上空，飞过时发出又大又低沉且挥之不去的声响，仿佛将永远停留在那里。自此，我的恐慌感倍增。在几天无法获得充足睡眠和影响后，再加上满溢的恐惧和恐慌，使我筋疲力尽。自从我无法读书之后，我了解到现在的自己无法帮助到任何人，因此我开始寻找能帮得上忙的地方。」（Anastasiia，20岁）

「每当我想到要与谁分开或是我可能会失去某个人时，我就会哭。我相信现在的状况不会像电影里面所演的那么可怕，我们必须度过它。即使会有麻烦和争吵，我还是很爱我的家人和亲戚。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保持健康、继续活下去并且不要分开。希望一切都能平安渡过，我想要活下去。」（Kseniia，18岁）

「早上七点四十四分时，利维夫第一次响起了空袭警报。我从床上跳起，跑过走廊找邻居。一个紧张的笑容僵在我脸上，一阵冷颤窜进我的身体…」（Martha，18岁）

据说一个人需要从创伤中恢复的时间长短，端看他受到创伤事件的影响程度。恢复的过程可长达几个月、几年，甚至数十年，这取决于事件对个人造成的影响力和抗压性。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在我的观点中，现在在「目击引发的创伤」、「个人受到的苦难」、「寻找新的生命意义」、「军人焦虑症」、「创伤事件的集体恢复」等背景下，将因战争而起的集体创伤视为严重的军队压力进行研究，是再适合不过的。乌克兰现在的情形出现高度自我的组织。这个例子可能可以广泛作为预防集体创伤的启示，其结果更有深刻的心理治疗层面的意义，即它一矛盾的一对整体社会有富有建设性的影响。对乌克兰而言，将战争作为集体创伤来克服代表：

- 1)与过去苏联时期的乌克兰、俄罗斯独裁政权的侵犯和「俄罗斯世界」做最终的切割；
- 2)结合国际保障提供的安全、和平和土地租借，创造修复土地完整性的机会；
- 3)打造公民社会，并且首先，拥有发起自主运动的能力。这已成为广泛并且也是努力建国的重要先决条件；
- 4)让乌克兰作为提名成为欧盟会员国的一员，打造一个欧洲视角；
- 5)打造创新的计划作为重建后战争时代的希望，并且在西方世界的参与以及大量国际计划的支持下，协助过去特别遭受到俄罗斯恶意的地区；
- 6)维护民主（公民）价值，打造他们在现代世界的不可侵犯性；
- 7)透过对战争下的国际作为的共同认知，打造国与国之间新的团结模式；
- 8)注意到乌克兰人为了国家自主性而奋斗的决心，和了解到乌克兰人已经以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打败了俄罗斯侵略者。

当然，要克服一个创伤不只需要整个乌克兰社会的合作，还要了解个体因为战争所遭受到的问题。我的想法是，可以让个体和集体从创伤中恢复的共同方法是大家要有深刻的信念，了解到他们已经取得胜利。■

Lviv，2022年6月25日

来信寄至：

Yuriy Pachkovskyy <ypachkovskyy@gmail.com>

1.（乌克兰语）<https://molodost.in.ua/news/7002/>（7月19日，2022）。

2.（乌克兰语）<https://poglyad.tv/u-moz-vvazhayut-shcho-cherez-viynu-kozhen-p-yatyy-ukrayinec-matime-problemi-z-psihikoyu-article>（7月10日，2022）。

> 乌克兰战争改变了我们的认知

Darie Cristea,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罗马尼亚

我曾在其他场合写过关于国际关系社会学和安全研究缺乏方法论的文章，也写过与新闻媒体业的互动关系甚密，可能是导致致命因素的关联。社会科学家着迷于展现他们的预言能力：为了证明他们有能力成为预言因果的典范，他们试图预测危机、趋势和选举结果。然而，每次他们都因预测失误而被指责：2020 年之前，社会学没有关注潜在可能发生的流行病；乌克兰战争的征兆被误读；每次选举期间，民意调查也不如媒体和公众预期的那样准确。

> 令人错愕的两年

过去的两年半充满了错愕。在一场史无前例的疫情之后，随之迎来的是一场如上个世纪我们所见那样惊人的战争，也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战争带给乌克兰的惨烈悲剧已经被广泛讨论，从难民到轰炸、坦克和被毁城市的景致中，西方世界不只因为战争而感到震惊，更从中得到学习。就像真正的外包工程，近30年来，人们一直相信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战略与安全研究、军事科学和外交正在处理这些问题，而西方社会似乎从这种担忧中解脱出来：难道没有人研究过这些问题，并采取行动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吗？那么，作为社会学家，我们从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学到了什么？

> 罗马尼亚与北约观点

自从罗马尼亚加入北约和欧盟以来，罗马尼亚人一直是欧盟内最亲北约、欧盟、美国的民族之一，这点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中得到印证。事实上，近年来全球对北约的主要批评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安全环境中，国家不再是对于他国造成威胁的原因，而多数的威胁源于与非国家行为者的不对称冲突（例如恐怖主义）；或例如一些关于国家在「论辩」国际秩序的个案，以上原因

都让北约这样由多国组成的庞大组织显得毫无用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虽然没有被俄罗斯正式承认为一场战争，但却重新确立了北约作为成员国安全的守卫者，并破坏了不结盟的理念（如：芬兰和瑞典）。

> 反建制的政党

近年来，欧洲出现了或多或少成功的反建制政党，其中许多具有民粹主义、主权或欧洲怀疑主义的面向。新冠疫情和为了控制疫情而做出许多努力的欧洲国家，为这些运动提供了平台，而他们所宣传的大部分是反疫苗、反封控或否认大流行的存在等议题。在罗马尼亚，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降低了这种反建制运动的吸引力，增加北约和欧盟的支持度。

众人对于有关对俄罗斯与反建制运动或他们大外宣主题的密切程度有很多猜测——尽管这非常复杂且难以证明。过去三个月中，我们看到这些运动与战争的关系是非典型的：从不公开讨论战争问题到说乌克兰不是很民主（好似这样说就可以改变俄罗斯是这场战争中的侵略者的事实）；从减少对战争受害者的同情到关注乌克兰的罗马尼亚少数民族，再到对侵略者的认同相对化。因此，乌克兰战争是对反建制政党，以及在普丁领导下的俄罗斯有众多弱点的试金石。

> 现实主义的复仇

1990年后，国际关系社会学存在某种历史终结的典范中：惨烈的战争，即使是冷战都已结束；自由主义战胜现实主义。可能发生一次性战争的地方都被解释为地方或地区层级；世界已经变成单极，众多平庸的大国无法挑战美国这个孤独的超级大国。2001年9月11日之后，剧本似乎只是表面上被改写，因为他们出现了另一个新的对手（恐怖主义）；这是一个由国家主义者维护的邪恶

「相较于验证假设，理解世界是更为重要的。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善用社会科学的多重典范，这将能祝我们一臂之力。」

轴心，挑战世界秩序、武装斗争等变成了犯罪行为，而不是战争。国际体系不再是1990年后想像中的和平体系（尽管此概念与一次性战争多次相互矛盾）。一个不对称的、非常规的敌人出现了。但从军事上来谈，世界并没有面临巨大的危险，西方对全面战争的发生只存在微不足道的恐惧，美国/北约仍然是国际体系核心的超级大国。该系统仍然是自由主义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说，罗马尼亚将成为通往新俄罗斯的桥樑。西方世界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背后是软实力的因素。西方正在扩张，因为有追随他们的候选国正向他们前来。

然而现实主义将可能付出代价。2010年之后，中国作为经济强国不再被忽视。大约同一时间，俄罗斯和中国似乎都不愿意「同意」过去二十年的世界秩序。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俄罗斯会看到它在2008年入侵乔治亚；2010年代初期，俄罗斯为阻止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转向欧洲一大西洋势力做出了一些重大尝试；2014年，俄罗斯支持顿巴斯叛乱，随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在西方社会，人们看不到欧洲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所以这些事件相对轻松地过去了。如今，俄罗斯不再是2010年前的那个国家，它开始被视为潜在的侵略者，而非维护世界秩序的一员。

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场连普通老百姓都无法理解的侵略行为。乌克兰转向西方的举动会使俄罗斯容易受到北约和欧盟的影响的这个想法是令人难以理解的：2014年，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恶化的年份；而俄罗斯大众对战争的支持更令人难以置信。但专家可以意识到，在经过近100年的理论竞争之后，采用现实典范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拒绝，似乎赢得了国际关系典范间的辩论。

此外，战争及导弹、坦克、头盔和机关枪就像50年前战争纪录片和电影清楚表明战争没有消失。1990年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几乎没提的核武器，同样未曾消失。甚至这现象背后的理论也不是新的。几十年的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船过水无痕，彷彿回到朝鲜战争和古巴导弹危机。

总而言之，我们处于典型的全面安全的困境中。北约没有直接介入乌克兰，但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至于，俄罗斯会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呢？东欧对战争的恐惧达到了自1990年以来最高的临界点。现代战争与过去没有什么不同：非经济的、不在网路上、不文明、不保护平民。现代战争是最经典的，且更具破坏性。政治家、军队、分析家和普通老百姓在虚幻的舒适中生活20年了。我们不要忘记，假新闻和俄罗斯宣传已经讨论多年，尤其在2014年之后，大多数人使用了「资讯战」这个词，貌似它取代了真正的战争。我们现在看到假新闻正宣传一直在做的事情：它为一场真正的战争做准备，并正帮助管理着这场战争。

> 勿忘摩尔多瓦

如果我们从罗马尼亚的角度思考乌克兰战争，就必须提及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对于摩尔多瓦共和国，和其相应身份系的敏感是众所周知的。1990年当摩尔多瓦孤注一掷地再次站在「墙」的另一边，而罗马尼亚只有一个延续的政治蓝图：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看来这个蓝图奏效了。目前的担忧之一是与德涅斯特河沿岸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冲突可能会扩大（迄今为止闻所未闻）有关。摩尔多瓦可能是一个被认为相信维持中立是有用的国家中最好的案例。因此，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尝试：摩尔多瓦30年来一直试图与欧盟/罗马尼亚，及俄罗斯保持功能层面的关系。

简而言之，我认为研究人员的首要义务是取代预测未来的主张，关注他们可以如何找到适当答案的情境。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现实与理论不符。毕竟，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在理解世界比验证我们的假设更重要的情况下使用它，那么社会科学的主要缺陷——它们的多典范特征——就可以证明是一种卓越的特质。■

來信寄至：

Darie Cristea

<darie.cristea@sas.unibuc.ro>

> 为何我们需要 LGBT+ 族群的比较交织资料

Sait Bayrakdar, King's College London, 英国, Andrew King, University of Surrey, 英国



了解不平等的程度对于制定知情政策以改善LGBT+族群的生活至关重要。

来源: Sait Bayrakdar。

过去的几十年里, 尽管许多欧洲国家在 LGBT+ 议题上有重要的进展; 但研究显示,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其他性取向的人所经历的不平等现象仍持续存在。许多人在工作、公共场所甚至是在获取公众服务时, 皆会面临这个社会对于他们的歧视。

> 现今资讯限制的不平等

为了改善 LGBT+ 族群生活以及制定正确的政策, 了解「不平等的程度」相当重要。然而, 如今政策制定者尚未得到取得这项资料的权限。如今已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年头, 许多调查也

尚未例行地搜集关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资料; 时至今日, 许多大型调查仍然不包括性别认同。

这些数据的局限, 限制了各国对 LGBT+ 不平等现象盛行率的比较, 因为资料的调查和搜集总是被侷限于国境内。研究人员通常只搜集国内资料, 也只在国家内的立法、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下讨论不平等经验和现象。毋庸置疑, 这些以国家为单位的资料是重要、有用的; 然而, 这样的研究方法往往受制于其实践性, 还有它只能在当地的脉络下被使用, 因此无助于我们理解 LGBT+ 的不平等的改善方法如何推广到更广泛的场景中。只参考国内数据的研究, 往往不允许研究人员看见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下, 这些不同是

如何对LGBT+不平等的现象产生影响。虽然一些像是政策干预所造成的影响，可以透过追踪资料被看见，但是像社会过程这类有长期影响的因素，即使花更长时间做研究也很难被捕捉到。

> 为什么资料应该要具有交织性与比对性？

采用相对比较法来探讨各国的不平等现象，使我们能够更了解社会脉络因素如何形成他人对于LGBT+族群的不平等和歧视行为。从社会学和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这都应该要被认为重要的。它将重点由个人转向社会脉络因素，并强调结构因素对于平等的实现确实存在许多阻碍，因此，资料的比对在社会学上具有重要意义。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不同国家的互相比较能创造对双方皆有利的结果，也才得以凸显政府和其他组织未能有效实施的政策，以及他们需要更加关注的领域。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当调查没有搜集关于社会身份的详细资料，如：性和性别认同，就会妨碍研究人员在国家之间进行比较，也会阻碍跨群体之间或者所谓的「交织因素」的比对（也就是LGBT+群体内部特征上的差异，如：针对阶级、种族、宗教信仰、能力等等的比对）。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些交织的差异，以便制定更有包容性的政策，为LGBT+社区的所有个人服务。

> 交织与比较研究的前瞻性

我们在 [CILIA-LGBTQI+ 计划](#)中应用了一种交织比较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透过在四个欧洲国家中生活LGBTQI+公民，交织比较他们生活经验中的不平等）。这项计划在英格兰、德国、葡萄牙和苏格兰进行。计划开始时，我们进行了文献回顾以及资料对应，以确保能辨识出在比较交织知识下产生的资讯。然而我们发现，能使我们进行跨国和交织比较的资料来源非常有限。庆幸的是，欧盟推进基本权利的机构有许多针对欧盟境内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调查（[EU LGBT 调查](#)）而这些资料非常有用。它包括来自28个欧洲国家LGBT群体的个人资料，并考察过他们所遭遇的生活经验、受歧视的经历和人口统计等特征。这项调查交织比对的问卷设计，以及详尽的LGBT相关经历和事件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利用关注国家背景的比较方法去探索不同族群的交集。

> 具比较性和交织性的研究结果

透过[分析](#)，我们检视发生于德国、葡萄牙和英国的LGBT+群体所遭遇的歧视、骚扰和暴力问题。资料显示这三个国家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在生命经验上惊人的差异。例如，在这三个国家中跨性别者似乎更有可能经历歧视、骚扰和暴力事件；女同性恋者比男同性恋者更有更高的机会遭遇歧视和骚扰；男同性恋者则更可能面临受暴经验。总体来说，LGBT的经历是非常多样化的，这一点在政策制定的过程需要被赋予更多的关注。

此外，这三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有趣的差异。在英国，跨性别者可能遭受歧视、骚扰和暴力的机会最高，此外，针对他们的暴力也是最普遍的；而且，男同性恋者也比在德国和葡萄牙更有可能成为暴力问题的受害者。其他社会人口学的特征，也对塑造LGBT个人的经历来说至关重要。例如，三个国家中来自少数民族或有残疾的人，都有更高遭受到暴力的可能性；另外，在德国和英国，经济资源的增加（以家庭收入为计量单位）似乎会减少遭受暴力的可能性，但同样的现象在葡萄牙却没有发生。

> 如何推动政策发展

各种细微的差异都值得关注，因为它们意味着国家内部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社会脉络因素都影响了 LGBT 群体的个人经历。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料交织比较 LGBT 群体的不平等问题。我们的研究成果显示：相对于为阻止不平等发生而「制定法律」的作法，更积极去面对问题的方法是透过了解歧视、骚扰和暴力如何影响LGBT群体的个人生命经历；而这也是制定政策以解决问题的首要步骤。这研究，也能供我们了解结构和社会脉络之间的相互交织，并理解这些因素如何塑造 LGBT 的生活，进而带领我们走向更平等的未来。■

來信寄至：

Sait Bayrakdar <sait.bayrakdar@kcl.ac.uk>

Andrew King <Andrew.king@surrey.ac.uk>

> 谁知道？认可、引述与知识的不正义

Jana Bacevic, Durham University, 英国



来源:Pixabay 2016°

在许多层面，学术专业越来越多元化。自1990年以来，多数大学生与硕士生是女性。在欧盟，女性大约佔大学生的54%、硕士生的58%、博士生的48%，但教授中仅有24%的女性。少数族群学者在学界的代表性不足：举例而言，在英国，仅有7.3%的教授是黑人或少数族群学者。

> 教育、知识与社会正义间的关联

近年来，不平等明眼可见的提升，部分原因可归功于非殖民化运动的课程，人们逐渐意识到教育、知识与社会正义间是互相关联的。然而，社会不平等与知识不平等间的关联根深柢固，我们不应只着眼于教室中谁在读书、谁在教书，也应该检视课程中的知识，包含在阅读清单中：哪些人被代言？哪些知识被形构成正确的？如此形构的原因为何？

知识不正义的概念描绘出社会不平等如何形塑「谁有资格被认可为值得信服的／可靠的知识持有者」。Miranda Fricker 将此一现象概念化，这个概念同时受到哲学家、女性主义认识论者，与其他研究不同形式的「可信度过剩」或「缺陷」学者的影响：身份偏见的不同形式，如何影响他们对于知识主张的回应与阐释的差异。举例而言，在法院中，一个人能否被视作「可信的证人」，取决于他的阶级、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种族／族群，这往往会对边缘化或历史上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更加不利。

然而，不平等不只作用于个人知识的层次，也是知识的生产、衡量、评价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不平等存在于全球政治经济的知识生产中。在这种意义下，问题不仅是谁能被视为有效知识持有者，也在于这些知识持有者被视为知道「什么」。作为一个社会理论家和知识社

>>

会学家，我将此称为知识主体（知道的人）与知识客体（他们所知道的）间的关系。

> 学术工作中的社会不平等再制

在〈知识定位与知识不平等：走向交叉性的政治经济〉一文中，我提出知识定位的概念，以呈现对「知道的人」的评断如何影响对知识客体的判断——反之亦然。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是，女性知识主张被认为是「情绪性的」或「经验性的」，然而男性或大多数学者则被归类为「理论性的」或「具有普遍性的」。有更多系统性的、险恶的可信度受损形式，例如，将批判种族理论或任何以身份为基础的知识探究，称「埋怨研究」。我称为「划界」，将特定知识主张划入个人主观经验（或埋怨），而非与科学知识有相同贡献的学术研究。

第二种定位——领域化——与第一种定位密切相关：特定的知道的人将知识贡献与特定的知识提供者身份挂钩。举例而言，女人在学术座谈会常被要求对于题目的性别与女性主义提出观点；黑人和少数族群则被要求针对「种族议题」说点什么。更复杂的是，这些定位的形式时常被学者策略性地操作出学术界的赞助与认可的网路。但他们也划定了「谁可以被视为是知道些什么的人」的界线：少数族群的学者时常被认定为他们身份或遗绪等相关资讯的专家，而那些白人或「没有特殊标记」的学者则能是任何方面的专家，这使得他们的学术资本更能够被兑换：如果你可以教更多主题，相对于那些只专精于特定领域的学者，会有更多职业上的选择。再加上「界线」，即降低知识宣称其生产者身份的作为，导致学术界再制了社会不平等。

> 马太效应

然而，学术生涯的成功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在适当的环境中受到认可的结果，这往往也是是否被认可、被信赖的问题。女性与少数族群学者经常经历第三种形式的定位：无贡献——他们的成果在没有被引用或表彰的情况下被使用。有时，甚至恶化到全然的「挪用」，功劳全归于他人——常常是男性、白人、资历较深、享有特权的人。这样的现象，社会学称之为马太效应。

科学上的马太效应通常被认为是Robert Merton提出的（以马太福音命名：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馀。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走。），描述科学发现的功劳，往往会归给团队中拥有最深资历、最受到认可的科学家。在1993年，Margaret Rossiter 创了一个相关术语「玛蒂达效应」（Matilda effect），概念化学术功劳常被归于男性而非女性的现象。但鲜少社会学家知道，玛蒂达效应与马太效应最有名的案例，正是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最早以 Merton 之名发表一篇名为〈科学中的马太效应〉在《科学》杂志中，这个概念由 Merton 与 Harriet Zuckerman 共同发展而来，他们对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为这个概念提供了关键性的素材。甚至，Merton 在《马太效应》第二版与第三版的书中清楚承认，他在注脚中提到，自己「引用了 Zuckerman 研究中的访谈与其他资料，因此显然地，文章应该要由共同作者发表。」以及「不管晚了多久，对于分配与交换正义的充分意识需要有人了解到，书写一篇科学与学术论文并不足以认定自己是文章的唯一作者」。然而，这并未改变人们对这个概念的记忆：至今为止，大多数的社会学家依旧认定是 Merton 创造了这个概念。

> 对知识正义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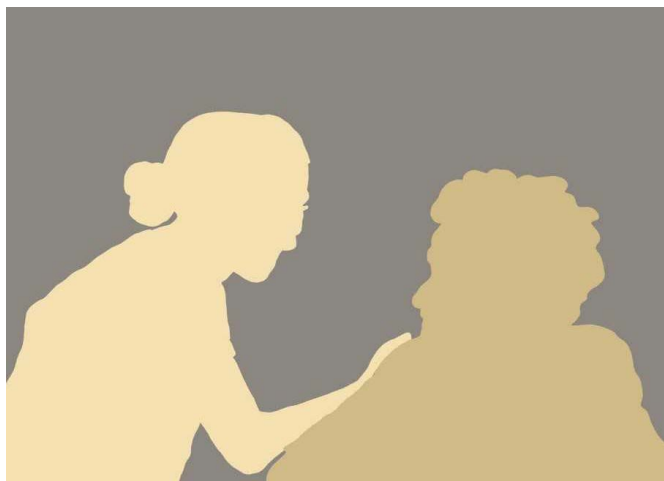
这表明，迟来的作者主张无法扭转认知不正义的长期影响。要求获得认可的女性与少数族群学者长被视作讨人厌的、好斗的、或小气的人。界线与领域的划定使得合理化将某些人排除在参考名单之外变得更容易——如果他们的研究只关注特定对象（比如大学而不是权力）或研究只基于经验（而非理论），和特别是他们对此表现的「小气」。

随着学术领域的专业与作品越来越多元，我们必须时刻持续关注——哪些人在这个过程中被排除了？哪些特定的学者被认为没那么重要、不那么值得相信、或不那么适切？知识正义要确保每个人都有在做事，且能得到相对应的肯认。■

来信寄至：
Jana Bacevic
<jana.bacevic@gmail.com>

> 中东欧的盈利身体与照护流动

Petra Ezzeddine, Charles University Prague, 捷克, Kristine Kraus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荷兰



跨国照护景观既需要照护的身体,也需要被照护的身体。
来源:Line Mörat。

在维谢格拉德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匈牙利),由于照护制度整体的市场化、人口外移、性别关系的变化以及人口日益的高龄化,照护的地景正在迅速变化。这些发展导致了由不同的商业行动者(包括一些水疗和观光部门)所组成的照护部门,面临了更加复杂和多样化的处境,同时也影响了家庭和国家的角色。此外,由于女性外移到更富裕欧洲国家的照护市场所产生的缺口,照护服务受到了挑战。与此相关的是,尽管涉及的人数更少,但老年人却反而朝相反的方向流动,到照护费用比昂贵的邻国低三分之二的国家。

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专案「中欧的跨国照护地景:私有化、市场化以及重叠的流动」和「[欧洲内部的照护迁移](#)」中,我们调查了这两种相互关联的照护流动:在德国的,来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移民照护人员;以及迁移到维谢格拉德国家照护机构的德国高龄市民,这一微小但具有象征意义的现象。两种趋势都可以被理解为盈利的共谋:从「工作」的身体(移民劳工)中提取劳动力,以及从虚弱的老人身上提取「权利」。

> 社会再生产、社会身分和身体

尽管身体是社会再生产与社会身分的核心,却是容易被忽视的。然而,它是潜在的、充满张力的动力,在最小规模内所汇集的重要节点:身体需要被培养、清洗、着衣以及休息。为了使工人的身体能够工作,其他身体必须提供服务。

社会再生产是马克思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一个术语,用来描绘所有需要被培养、被修复、被保养的,维持社会日常生活的无形工作,包括其社会关系以及维系人们所生活的环境。在相应的意义上,社会身分指涉的是获得社会保障和教育的权利,这些权利应该使人们成为并且维持一个,健康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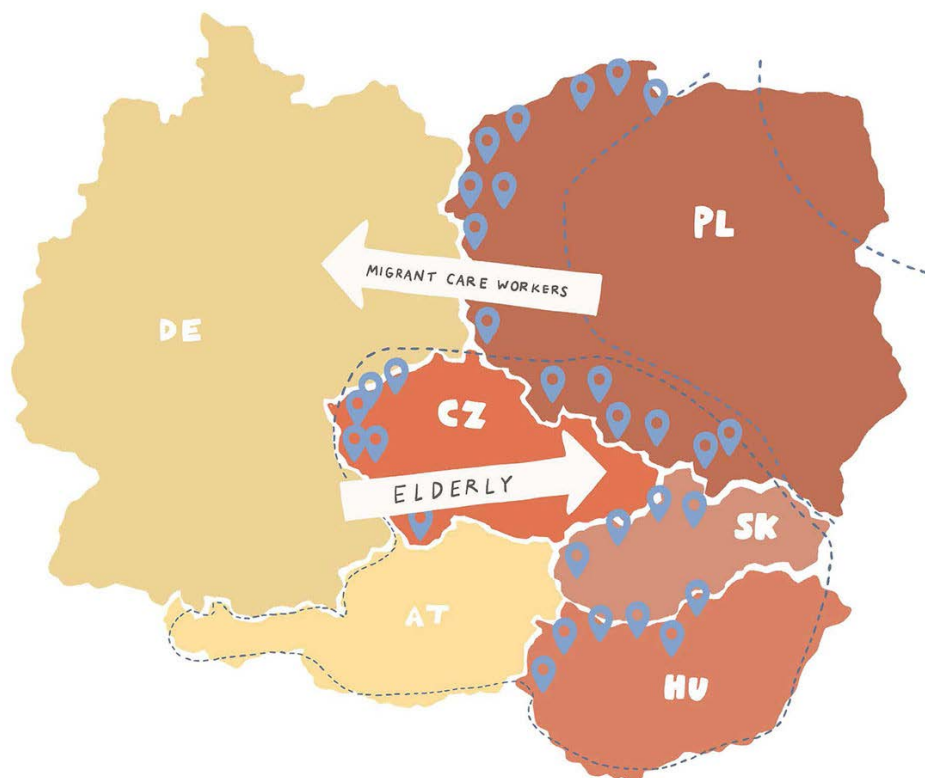
因此,社会再生产和社会身分是密切相关的。使「生活」和社会运作成为可能所需要的,广泛层面的体系与基础设施的再生产,都有这两者参与其中,包括照护工作。当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时,就会出现社会再生产的问题;比如当老人被转移到照护机构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可以被视为社会身分的转移。在试图理解欧洲的照护流动地景时,我们使用社会再生产和社会身份这两个术语作为分析工具。

> 中东欧地区的照护流动地景

通过古往今来各种方式的人口流动下的劳动力迁移,与中东欧的照护外包以及私人照护设施的出现有所关联。例如,曾在德国工作过的波兰看护移工现在是波兰私人疗养院的创始人之一,他们也因其工作经验和语言技能而作为热门的职员。招聘机构已经发展起来,为家庭提供中介服务,将他们与该地区的疗养院联系起来。此外,维谢格拉德国家私人疗养院的老人的子女往往是移民到另一个国家工作,从而赚取足够的钱

>>

欧洲内部的照护重新安置过程。
来源: [ReloCare](#)。



来支付他们父母在家乡的照护服务。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老人本身甚至就是回国的移民,他们在奥地利或德国度过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后,从这些国家获得了纳保的权利,因而得以负担私人照护服务。这些情况使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身分问题更加复杂。

在维谢格拉德国家,私人照护机构的出现似乎与人口外移造成的照护缺口直接相关,在我们研究的一个例子中说明了这一点。在捷克境内距离德国仅2公里的一家护理院里,德国和捷克的老年市民被一起照顾着。然而,他们的护理不是由捷克照护人员所提供的,因为这些人已经离开了捷克市场,到德国从事报酬更高的照护工作;而这些工作(在捷克境内)反过来则由来自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照护移工填补。

> 结论

中欧的跨国照护地景从照护的身体和被照护的身体两者中提取利润。我们可以通过两个相互关联的现象观察到该地区中的跨区域—社会

再生产:(1)由于(女性)照护人员的人口外移,导致照护服务的跨国化,在他们的原籍国出现「照护缺口」。(2),老年人被重新安置到照护费用大约是原籍国的三分之一的地方,产生了在范围和规模上要小得多的,照护外包的反向现象。这两种现象都挑战了我们对权利和社会再生产的认知,以及欧洲社会的公民权与照护制度的概念。我们认为,这些照护的流动性阐明了身体是如何参与到欧洲的社会再生产与公民权的危机中却又被忽视,以及其背后不均衡的福利环境。■

來信寄至:

Petra Ezzeddine

<Petra.Ezzeddine@fhs.cuni.c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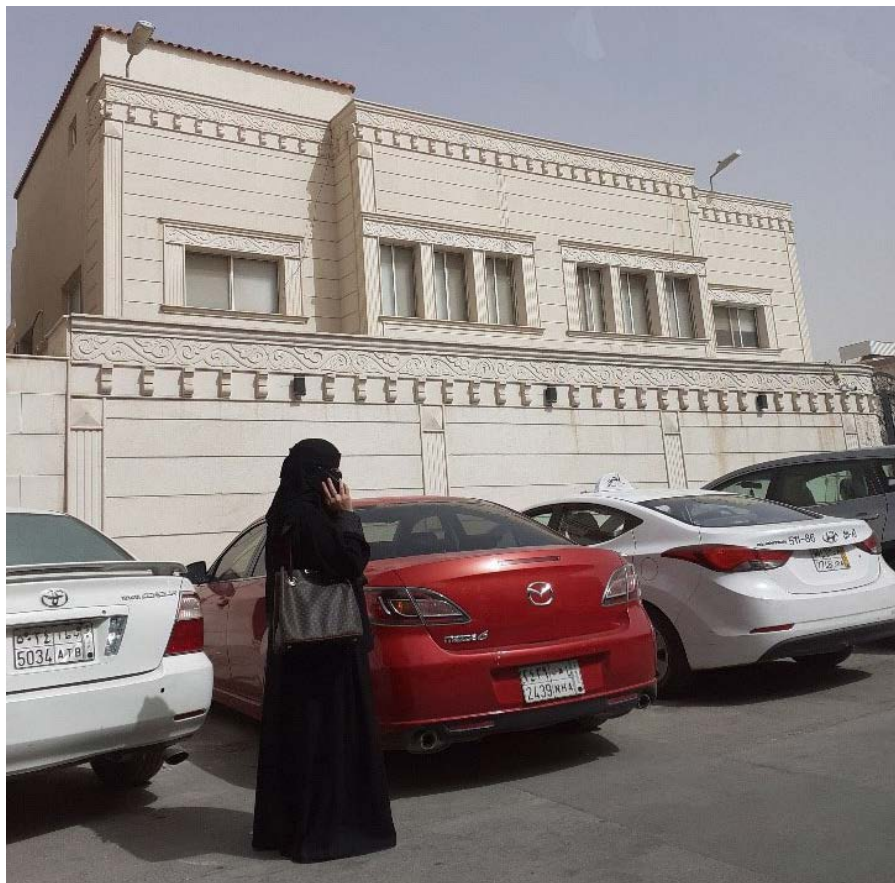
Kristine Krause

<k.krause@uva.nl>

> 仲介家务工作： 斯里兰卡—沙乌地市场¹

Wasana Handapangoda,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奥地利

一个沙乌地雇主。
来源：Wasana Handapangoda。



自 80年代初以来，斯里兰卡妇女作为家务劳工大量移民到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海湾。这种劳动力外移是由1977年斯里兰卡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以及1973年阿拉伯的石油危机所产生的结果，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有偿家务劳动开闢了一个丰富的市场。今天，就对外汇收入的贡献而言，家务移工的劳动力已成为斯里兰卡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在海湾地区的家务劳动进口国中，沙乌地阿拉伯仍然是重要的，斯里兰卡和沙乌地阿拉伯在全球照护市场上形成了互利的、长期的买卖双方交流。因此，斯里兰卡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跨国劳动力仲介，以国内劳动力为交易对象，获取佣金，也就是工人的汇款。

在照护体系的仲介过程中，私人仲介发挥了核心作用：大多数斯里兰卡妇女在海湾地区寻找有偿家务工作时都会寻求他们的协助。本文简要介绍了私人仲介在斯里兰卡—沙乌地照护市场上的照护仲介，这是照护体系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借鉴了2019年和2020年分别在斯里兰卡和沙乌地阿拉伯所展开的田野调查。

> 家务移工的仲介过程

家庭照护劳工在斯里兰卡—沙乌地移动路径上的流动过程，涉及到位于斯里兰卡和沙乌地阿拉伯的私人仲介，他们在斯里兰卡的家务移工

>>

和沙乌地雇主之间提供了重要的跨国联系,以实现家政服务的市场化。

作为各自政府外包的私人招聘机构,斯里兰卡(在地机构)和沙乌地阿拉伯(外国机构)的这些私人仲介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组织和促进家务移工的流动。流动的过程开始于雇主向外国机构发出斯里兰卡家务移工的「工作订单」。随后,外国机构获得斯里兰卡驻沙国代表的法定程序批准,并将批准的合同发送给在地机构接手。在地机构在获得斯里兰卡外国就业局的合同登记后,开始寻找有意愿的家务移工。对他们进行筛选,并选择那些符合标准的人。例如,工资、年龄、经验、语言能力(阿拉伯语)和宗教(穆斯林/非穆斯林)。在寻找有意愿的家务工作者时,斯里兰卡的乡镇市区级别的次级代理所提供的的汇兑服务被证明是有用的,它是连接都市与乡村的在地机构有以及有意愿的家务移工的桥梁,将跨越地理和社会空间的人们联系起来。

被选中的候选申请被发送到外国机构,雇主从中选择一个最符合他/她标准的家务移工。在雇主确认后,在地机构继续推动移住过程,帮助家务移工获得斯里兰卡外国就业局的批准,以及必要的文件,包括护照、签证、医疗和外国就业局的培训证书,以及两年的工作合同。在地机构还承担家务移工的机票费用和个人化的佣金,所有的招聘费用都从仲介费中回收。最后,在家务移工到达沙乌地阿拉伯后,外国机构会在机场接待她并将她委托给雇主。在合同期间,在地和外国机构都要为家务移工提供必要的后续服务,例如,在她被雇主虐待的情况下进行干预。

有趣的是,这种有偿家务劳动的私人安排并不便宜。一个斯里兰卡家务移工需要约3500美元的在地仲介费。这个在地仲介费由国外机构承担,可以让外国机构从雇主支付的仲介费中收到约5500到6500美元。仲介费可以因此根据家务移工的年龄、经验、宗教、语言能力和推荐人等因素而变化,这些因素决定了她在照护市场的「价格」。

> 私人仲介:制度推手还是危害?

斯里兰卡家务移工的经验和移住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和外国的私人仲介,仲介为他们提供了策略资源,是出国进程的协助者。

仅管如此,有鉴于绝大多数的家务移工都来自早已工作不稳定、贫穷的背景;如果他们还没有处在过于不稳定的工作的话,私人仲介在家务移工的工作不稳定性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仲介往往负责创造结构性条件,在流动过程中危害家务移工的生活,主要表现在过高的仲介费、虚假资讯以及缺乏进一步的服务等方面。其中,仲介费通常被认为是过高且不合理的,与契约/抵押劳动的情况有明显的关联。鉴于仲介费很高,并且是由雇主承担,对家务移工来说,这促成了他们与雇主之间的契约关系,并导致了他们在沙乌地家庭中不良的工作条件。

私人仲介是斯里兰卡—沙乌地跨国照护市场上的「必要之恶」。对于家务移工来说,他们是实现其移住路径以及其对社会经济流动的盼望之关键。同样,对于处于照护链两端的国家来说,他们也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的仲介。总而言之,私人仲介显然是斯里兰卡—沙乌地移动路径中,一个永远存在的现象。

> 结论

斯里兰卡—沙乌地家务照护体系的仲介,是资本主义市场对社会再生产的渗透,以及由此产生的失序现象,的一个理想案例。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平台上,私人仲介越来越多地将家务劳动力作为一种理想的商品,从而引发了经济潜能与过度的工作不稳定性间的矛盾论述。在这个意义上,仲介家务移工质疑了工具性目的侵入再生产领域的适当性;然而,它同时开启了一个可能性,使得再生产领域和生产领域在照护市场上形成同盟。■

來信寄至:

Wasana Handapangoda

<wasana.handapangoda@jku.at>

1.这借鉴了研究专案:‘Ideal’ Migrant Subjects: Domestic Service in Globalization,由奥地利科学基金(FWF)资助,Project M 2724-G‘Lise-Meitner-Grant’,11/2019-10/2022。申请/负责人:Wasana Handapangoda 博士,共同申请人/指导:Brigitte Aulenbacher 教授,约翰克普勒林兹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理论和社会分析学院。